

分类号:

密 级: 公 开

学 号: 20182004110

单位代码: 10759

# 石河子大学

##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 石一枫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学 位 申 请 人	<b>宋园园</b>
指 导 教 师	<b>张凡副教授</b>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b>文学硕士</b>
学 科、专 业 名 称	<b>中国语言文学</b>
研 究 方 向	<b>中国现当代文学</b>
所 在 学 院	<b>文学艺术学院</b>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1年6月

# **Research on the Theme of Shi Yifeng's Novel Creation**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Shihez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By

**Song Yuan-yua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Zhang Fan

June,2021

# 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研究生签名：宋圆圆

时间：2021年5月28日

## 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石河子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在学校图书馆保存并允许被查阅。有权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学位论文编入有关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研究生签名：宋圆圆

时间：2021年5月28日

导师签名：北凡

时间：2021年5月28日

## 摘要

石一枫是中国当代文坛“70后”的青年作家，其作品具有戏谑、幽默、反讽、隐喻、荒诞等风格。身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石一枫在前期创作中一直精耕细作于他熟稔的北京城及生存空间中的各色人物，其作品也较多涉及北京的“大院文化”以及“顽主”形象。随着这些年来大量的文学实践和平日里写作上的日积月累，石一枫的作品变得日臻成熟，创作主题也日趋多元化，在这多元化背后蕴含的是他对各种社会问题及人类精神困境的热切关注。通过细读其小说，能够看出他的作品不会局限于单一主题，往往是通过一些我们平时容易忽视的小故事来呈现多重主题。

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石一枫小说中呈现的成长主题，主要包括“大院”子弟的成长、“异乡漂泊者”的成长，其中石一枫塑造了一系列游走于城市边缘的、来自外乡的年轻人形象，借以表达作家自身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和对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年轻人时下命运的一种思考。通过对石一枫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类人物形象的成长历程进行分类处理，与“70后”作家创作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其创作共性，抽象出石一枫所关注的普遍的个体成长史。

第二章主要研究石一枫小说中呈现的社会问题意识，由于这部分文本是其转型成功后的主要作品，因而会着重讨论，主要探讨其作品中关注到的人类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及动物叙述视域下的“人性”反思问题。随着写作技艺娴熟，石一枫不再囿于北京城和北京人的书写，而是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开始关注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乃至“人性”的反思等庞杂而宏大的主题。因此，本章重点分析石一枫转型后的问题小说创作，把握其创作内核，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进行关照，发掘其创作对“70后”作家群体的贡献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贡献。

第三章探究石一枫小说中城市书写背景下的“审丑”意识，其小说创作以城市为，表现独特的城市景观。在城市背景的视域下，利用“审丑”的方式独一无二地提炼人物群像，发掘出扭曲的人物情感和人物群像的种种“丑态”，展现出作家对城市、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究。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把握石一枫小说创作主题的日渐丰富、深刻的特征，了解其创作的整体风格特点。

**关键词：**石一枫；创作主题；成长；社会问题；“审丑”

## Abstract

Shi Yifeng is a “post-70s” young writ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 works are characterized by joking, humor, irony, metaphor and absurdity. As a Beijinger born and grown up in Beijing, Shi Yifeng has been meticulously written in his early works in his familiar Beijing city and various figures in the living space, and his works are also more related to Beijing 's ' courtyard culture ' and ' stubborn master ' image.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ry practice and writing in peace days over the years, Shi Yifeng's wor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his creative them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Behind this diversification lies his keen attention to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nd human spiritual dilemma.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his novels, it can be seen that his works are not limited to a single theme, often through some small stories that we often easily ignore to present multiple theme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nclusion, and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zes the growth theme presented in Shi Yifeng's novel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children of the "courtyard" and the growth of the "wanderer in a foreign land". Shi Yifeng has created a series of images of young people who live on the edge of cities and come from other places. In this way, the writer expresses his concern for the real society and reflects on the fate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classifying the growth process of several types of characters that appear frequently in Shi Yifeng's novels, and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creation of "post-70" writer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commonness of their creation and abstracts the general individual growth history that Shi Yi-feng is concerned about.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studies the awareness of social problems presented in Shi Yifeng's novels. Since this part of the text is the main work after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it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mainly to discuss the plight of human survival, spiritual plight, and the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imal narrative. With the mastery of his writing skills, Shi Yifeng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writing about Beijing and its people. Instead, she has jumped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and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complex and grand themes as the universal spiritual dilemma of human beings,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society and the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Therefore,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hi Yifeng's problem novel creation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grasps the core of his creation, puts it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or consideration, and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of his creation to the "post-70" writer group and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The third chapter explores the consciousness of "examining ugli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ity writing in Shi Yifeng's novels. Her novel creation takes the city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unique urban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background, the author uses the method of "examining the ugliness" to uniquely extract the group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to discover the distorted emotions of the characters and various "ugliness" of the group images, and to show the author's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ity and human nature. The epilogue summarizes the full text, grasps the increasingly rich and profound features of Shi Yifeng's novel creation theme, and understands the overall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creation.

**Key words:** Shi Yifeng; creation theme; grow up; social problems; appreciation of ugliness

#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II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及对象概说.....	1
二、石一枫小说研究现状.....	2
(一) 比较视域下的作家作品研究.....	3
(二) 石一枫小说文本细读研究.....	4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6
四、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青春成长主题.....	8
一、“大院”子弟的成长.....	8
(一) 逃离与皈依.....	8
(二) 孤独与叛逆.....	11
二、异乡漂泊者的成长.....	13
(一) 形象与性格的变化.....	14
(二) 隐喻式成长.....	16
第二章 社会问题剖析.....	20
一、再现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20
(一) 边缘化职业.....	21
(二) 边缘化生存.....	22
二、精神困境.....	24
(一) 信仰的困境.....	24
(二) 道德的缺失.....	25
三、动物叙事视域下的“人性”反思.....	26
(一) 人与自然之关系.....	27
(二) “兽性”与“人性”.....	28
第三章 城市书写视域下的审丑意识.....	30
一、城市景观的描摹.....	30
二、“审丑”视角对城市人物群像的提炼.....	34
(一) “审丑”视角.....	34
(二) 人物情感之扭曲.....	35
(三) 人物群像之“丑”态.....	37
结 语.....	41
附 录.....	43

参考文献.....	44
致 谢.....	48
作者简介.....	49
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50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对象概说

虽然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70后”作家却整体处于一个尴尬的断层面。首先，他们面对“50后”“60后”作家们的经典作品，有不可避免的“影响的焦虑”；其次，他们想延续老一辈作家们的写作模式，走“50后”“60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之路；最后，“80后”“90后”的新兴网络作家乘着互联网的快车，在消费主义狂潮中获得红利、争取读者、占领市场，直接走上“经典化”之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70后”作家只能被割裂和悬置，造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憋屈和矛盾，他们只能在网络与现实之间，凭借对写作的一腔热血继续创作。然而，“70后”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和见证者，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便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变革初期的阵痛和混乱。事实上，这些成长背景让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去书写历史、书写现实，他们拥有独特的一手创作材料和写作技巧，能够创作出不愧于时代、不愧于自己的作品。

“70后”作家石一枫，实际上生于1979年，他既了解“70后”的成长轨迹，也目睹了“80后”的成长之路，在“70后”眼中，他是年龄最小的，而在“80后”眼中，他又是隔着一个代际的存在。这样矛盾的生长背景，致使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70后”“80后”为主。石一枫1996年在《北京文学》发表自己的处女作《上学》后便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继续以军属身份在北京的部队大院生活。凭借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加之受到王朔和崔健的一部分影响，他对“大院文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早期小说如《红旗下的果儿》（2009）《恋恋北京》（2012）以及《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2012）等，都是以戏谑的笔触、“京片子”式的语言、个人化青春叙事的姿态来写作，虽说受到王朔的某些影响，但是在书写“大院文化”时，石一枫笔下的人物明显与王朔不同，王朔的笔下有较多的揭露和批判，且写作视角聚焦于竞争关系和失败者；而石一枫笔下的人物却更多涉及一些“无所事事之徒”，这些人关心自己远远超过关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石一枫解构了王朔笔下的“大院文化”，并试图建构一种新时代背景下的“大院文化”。

或许是自身写作经验的积累，或许是受到师长的点拨，抑或是二者兼有之，自2014年以来，石一枫的创作风格与之前的青春叙事写作有了明显的不同，创作数量和质量飞速提升，发表了《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地球之眼》（2015）、《特别能战斗》（2016）、《营救麦克黄》（2016）、《借命而生》（2017）、《心灵外史》（2017）、《三个男人》（2018）等。2016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选“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十部作品之一和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

奖。2017年12月,《地球之眼》(2015)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自此,他不再精耕细作于自己所熟悉的“大院”和青年,而是逐渐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困境主题,学者孟繁华曾高度评价其转型后的创作,并在当时认为他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sup>①</sup>。

事实上,“70后”作家面对新时代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各种挑战,艰难地进行选择,在困境中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写作道路,出现了如魏微、乔叶、鲁敏、徐则臣、计文君、弋舟、俞胜、盛可以等等一批优秀作家,他们在不停的创作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石一枫处于“70后”和“80后”的夹缝中,并没有被已有名气的“70后”作家或者一些“80后”网络作家所裹挟,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石一枫的作品十分丰富,其创作主题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质,纵观其小说创作,其作品中经常关注的主题有三:其一,青春成长主题,主要体现在《红旗下的果儿》(2009)、《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我妹》(2013)、《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合奏》(2014)、《五年内外》(2019)、《白熊回家》(2020)等几部作品中;其二,社会问题剖析,主要体现在《地球之眼》(2015)、《特别能战斗》(2016)、《心灵外史》(2017)、《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白熊回家》(2020)等几部作品中;其三,城市书写背景下的“审丑”意识,主要表现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及《营救麦克黄》(2016)等作品中。尤其是2020年6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长篇小说《白熊回家》,一改写人的传统,转而采用寓言的形式描绘了光怪陆离的动物世界,表现了成长主题的同时,也揭露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充满了他对社会、对人类的思考,他以尝试的姿态建构“70后”“80后”的心灵史,也在不断建构“70后”作家的创作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50后”“60后”作家与“70后”作家之间的断裂现象。

## 二、石一枫小说研究现状

石一枫的小说创作聚焦社会现实,紧跟时代步伐,以其独特的成长经验和诙谐戏谑的口吻刻画他眼中的世界。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和作品不断面世,在文学评论界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对于石一枫的创作表现了充分的肯定和期待。

学者孟繁华将石一枫前期创作的三部作品《红旗下的果儿》(2009)、《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恋恋北京》(2012)命名为“青春三部曲”,他认为,这三部作品虽然没有情节故事的延续关系,但是它们的内在情绪、外在姿态和所要表达的与现实的关系有内在的同一性,它们都与青春成长有关。同时指出,“石

<sup>①</sup> 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4):174.

一枫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遮蔽了生活中更值得揭示和批判的东西。”<sup>①</sup>陈福民在《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里认为石一枫是一位标准的“青春后遗症”患者，他“通过自己的写作，生动刻画出这个时代中各个患者的艰难挣扎及其负隅顽抗。他以自己的小说写作捍卫了少数人的青春后遗症的权利与合法性。”<sup>②</sup>并且，陈福民认为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带有脆弱的先锋性和批判性。从《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到《地球之眼》（2015），石一枫放弃“顽主”式的“青春后遗症”写法，主动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向现实主义转变。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圆润细腻的故事，石一枫完成了个人化的经验叙述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的统一，实现了自我突破，关于这一点学者夏楚群在《告别“青春后遗症”：石一枫近作论》中对这一点有详尽的阐释。

总体而言，对石一枫前期创作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大多数评论和研究集中在其转变后的《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地球之眼》（2015）、《营救麦克黄》（2016）、《心灵外史》（2017）和《借命而生》（2017）这几部中篇小说上。《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在2018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已经相对成熟，可为挖掘的空间也变得开阔。目前，在其风格转变后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比较视域下的作家作品研究，二是石一枫小说文本细读研究。

### （一）比较视域下的作家作品研究

#### 1. 与“70后”作家放在一起比较研究

师力斌将“70后”和“80后”小说放置同一纬度研究，在其《思想力和小说的可能性——从石一枫、蒋峰看70后、80后小说》中谈到，石一枫偏重“现实”，他具有思想上的整体性和社会性；而蒋峰偏重“技术”，其作品具有碎片性和传奇性，并通过两者的对比来探索“70后”、“80后”作家的整体创作趋势。孟繁华在《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中认为，以石一枫为代表的“70后”作家们，敢于直面当下社会中的精神难题和精神危机并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他们有记录时代的自觉性，借此表达他们对时代的情感和立场。刘洋在《浅论70后作家的被表象遮蔽小说的创作特色》中更是认为，以石一枫、路内为代表的“70后”作家们，用看似不正经的叙事来抒发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

石一枫作为“7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和代表人物，他的创作与其他“70后”作家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因此，将石一枫与同时代作家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石一枫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也能让读者对“70后”的整体创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sup>①</sup> 孟繁华. 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N]. 中国青年报, 2011-10-25.

<sup>②</sup> 陈福民. 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N]. 文艺报, 2011-11-07.

## 2. 将其创作纳入同一年度所有中篇范围中进行研究

石一枫自2014年发表《世间已无陈金芳》至今，保持着一年一到两部小说的速度，不迎合市场和大众，精雕细琢，频出佳作。因此，将石一枫的中篇创作纳入同一年度所有中篇创作的大范畴中进行平行研究的论文也不乏其数。例如王迅的《2016年中篇小说概评》中评论石一枫的《营救麦克黄》（2016），谈到其书写的题材并非自己感兴趣的小说，但是读到里面有关人道和狗道的拷问，这部小说的意义就开始趋于优化，并指出“石一枫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及其深度开掘，为70后作家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参照。”<sup>①</sup>换句话说，王迅认为，与其他“70后”作家相比，石一枫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知识分子觉醒意识，带有人文关怀的特质。王一梅的《互看与重构——以〈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为中心的考察》从“互看”与“重构”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60后”“70后”“80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十位作家，其中对于石一枫《营救麦克黄》（2016）和《地球之眼》（2015）与其他作家做了对比，她认为石一枫的作品“牵涉出了对社会阶层矛盾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深刻反思。”<sup>②</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石一枫小说的可读性与可研究性还是比较高的，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视角。

不难得知，这种将石一枫的创作纳入同一年度所有中篇范围中进行研究的论文，只是简单的提出几个观点，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够，对于细部的挖掘较少，因此，对石一枫作品中展现出的多元主题进行深入的挖掘是非常有必要的。

## （二）石一枫小说文本细读研究

### 1.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出路问题

石一枫在近年来的几部作品中，关注大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以及底层青年的奋斗与出路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多批评家也已经注意到。

吴玲在《时代困局中的不弃言说——解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认为，《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延续了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主题，关注底层青年的奋斗问题，并将陈金芳为留在北京与家庭决裂的行为、对农村老家的逃离行为与“娜拉出走”联系起来，认为石一枫借此形象继续探讨自“五四”时期开始的“女性解放”问题，并试图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来重构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本论文中也会着重分析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但会从“多元主题”角度进行切入，以达到丰富石一枫小说研究的目的。曾于里在《超越“失败者叙事”——从石一枫的两个中篇说起》中，另辟蹊径，探讨《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和《地球之眼》（2015）两部中篇的“失败者叙事模式”按当下社会对成功的评判标准来看，陈金芳和安小男无疑都是失败者，曾于里认为《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采用的是套路化的失败者叙事模式，陈金芳的个

<sup>①</sup> 王迅. 2016年中篇小说概评[J]. 创作与评论, 2017(1): 40.

<sup>②</sup> 王一梅. 互看与重构——以《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为中心的考察[J]. 中国文艺评论, 2018(1): 80.

人奋斗之路以及最终失败的结局与涂自强、顾零洲等人相似，具有同质化倾向。这也是《地球之眼》（2015）的美学意义所在。学者李云雷在《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也指出，《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和《地球之眼》（2015）这两部作品着眼于当今社会中的“失败青年”。而《地球之眼》（2015）结构更宏大，意蕴更复杂，眼光更深远，作者通过安小男这一形象，试图向我们揭示全球化视野下资本运行的奥秘，并让我们反思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这一点上来说，石一枫的探索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孙湘婷在《阶级融合的终极追问——论石一枫的中篇小说〈营救麦克黄〉》一文中，她认为《营救麦克黄》（2016）继《地球之眼》（2015）后，进一步延续了对阶级矛盾问题的探讨和追问，并认为：就目前而言，不同阶级的绝对融合是不可能的，若要想真正走入大融合，那么只有彻底改变阶级差异，消灭贫富差距。因此，拟从问题角度对《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和《地球之眼》（2015）展开文本细读研究，深入考察其小说背后蕴含的“社会问题意识”。

## 2. 道德问题研究

除了底层青年的出路问题，石一枫作品中时时刻刻追问的道德问题也引起了很多评论者的关注。王诚良在《道德底线的文学追问——评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中谈到，该作品的主题是呼唤道德价值，思考道德底线，其中安小男、李牧光、庄博益三人代表了对道德底线的三个层次——安小男是道德的坚守者，而李牧光是道德缺失者，庄博益也即“我”是在道德底线上游移的“摆动者”。随着故事情节展开，“我”一次次受到灵魂洗礼，牢筑道德底线。“地球之眼”也是“道德之眼”，我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接受它的审视。迟晓旭在《社会道德的理性呼唤——读石一枫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中，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方法对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包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贺绍俊在《狗道主义与人道主义——读石一枫的〈营救麦克黄〉》中赞扬了石一枫强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他认为透过《营救麦克黄》（2016）这部作品，石一枫向我们展示了当今社会的一种荒谬且令人沮丧的现象：狗道主义盛行，人道主义举步维艰，而这一切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贺绍俊指出，在近几年的中篇创作中，石一枫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即两个不同阶层的人从友好相处到友谊破裂。他希望石一枫能超越这个模式。

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属细部研究，其应该归属于“社会问题意识”的一类，故而，论文不打算对其单独论述，而是将其纳入多元主题的研究之中。

## 3. 身份认同研究

石一枫以一个地道的“北京人”的眼光去审视那些外来务工的“京漂”一族，暴露出各种“京漂”形象在北京的身份认同问题。因此，一些学者渐渐注意到人物形象研究的问题，尤其以陈金芳为代表的女性研究。比如高阳的《不幸者、拯救者、反抗者——论石一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别从“底层生活的不幸者”

“男性拯救者”“命运的反抗者”三个角度切入，对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进行了阐释和反思。张梦婷的《从“陈金芳”到“陈予倩”——浅论〈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第二代进城人员的身份认同危机》则是通过分析处在城与乡的夹缝中的陈金芳的境况，以及她将名字改为陈予倩这一行为，揭示出“异乡漂泊者”深深的身份认同问题。孙雪在《消费主义文化下陈金芳自我身份的想象与重塑》和吴索伦嘎在《论石一枫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困境》也注意到了身份认同危机，分析了许多人在市场经济中因面临困境而不得不保持战斗姿态，其对人物形象背后身份问题、社会困境的揭示相对而言是比较客观的。

可见，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一枫的中篇《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上，对于其他作品、其他人物形象的研究还不够。不过，也有一篇关注男性形象的研究，吉林大学副教授李振的《“马小军”的人生道路——石一枫论》，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形象“马小军”来研究石一枫的创作观，并表示石一枫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日趋严肃且爱较真儿的青年作家。可见，对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大家抱有很大的希望和期待，在他的小说研究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视角和力量的介入。

综上所述，从作家研究到文本分析已颇具数量，但对石一枫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却稍显不足：一是目前学界对石一枫的关注多集中在他近几年的几部中篇上，对其前期创作缺乏关注，虽然其前期创作属于写作练笔提升阶段，艺术价值有待商榷，但是，研究其前期小说创作的主题，有助于帮助我们完整地了解作家的成长史和创作史。二是研究者大多聚焦于石一枫小说的思想内容、叙事技巧，总体而言，对作品的把握，对人物的挖掘尚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做一篇《石一枫小说创作主题研究》的硕士论文，便是此选题的出发点与着意点。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立足于石一枫小说文本，梳理石一枫小说的研究现状并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其小说研究的谱系，然后挖掘其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多重主题，可以探讨在当代文学视域下，作家介入生活、介入问题的方式，借以探寻石一枫小说创作主题流变的过程及作家自身的精神诉求。另外，关注石一枫小说创作主题的研究，能够窥知“70后”作家创作的共同心路历程及现实关怀，也是对当代“70后”作家创作的重新审视，具体意义如下：

#### 1. 理论意义

首先，随着新世纪文学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对“70后”作家的创作成绩需要重新审视，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70后”作家石一枫近年来佳作频出，不断攫取评论界的眼球，通过研读“70后”作家石一枫的代表性作品，分析其小说创作主题的背后意蕴，使读者对其笔下的“大院”文化以及北京故事有一个细致的了解，以此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新世纪以来对“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

其次，对石一枫小说作品的主题研究，有利于挖掘出其小说中最具文学史价值和艺术审美风格的作品，进一步提高石一枫在“70后”作家群体中的影响力，巩固和提升“70后”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 2. 现实意义

从青春成长主题、社会问题、“审丑”意识去关照“70后”作家石一枫小说创作的诸多切面，对于理解石一枫小说的整个创作基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对其作品中的北京文化、时代精神以及“70后”“80后”的心灵成长史有宏观的把握。

# 四、研究方法

## 1. 文献分析法

通过阅读石一枫著作及有关理论研究书籍来把握其小说创作特点，寻找研究石一枫小说创作的期刊资料、论文，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筛选整合，以便开阔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在确定石一枫小说研究的重点和主要方向、把握其创作研究的前沿动态后，对尚未研究的主题分析部分进行深入探究和挖掘。同时，关注石一枫的采访、座谈等咨询，了解作家本人经历和创作思想，以期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丰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

## 2. 文本细读法

把文本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观念世界，在深入的细读之中发现其所隐秘的意义，解读作品，了解作家。

## 3. 比较研究法

将石一枫前期和后期的作品进行比较，得出其作品风格转变后所具备的展现生活的特质以及对问题、对生命的思考意识；将石一枫与同代人“70后”作家的有关创作进行对比研究，概括出石一枫小说所具备的当代性、丰富性和地域性。

## 第一章 青春成长主题

青春成长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主题。“70后”作家避开了“50后”“60后”作家普遍关注的家国情怀、集体精神等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个体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在细微普通之处发掘出不一样的意义。石一枫在有关成长的文本中，大多依靠社会背景营造一种情感氛围，串联起生活中的细碎片段。然而，文本中不论是对“大院”子弟的描摹还是对“异乡漂泊者”的刻画，都饱含着石一枫对个体成长历程的密切关注，这其中也蕴含着他对自身成长和生活经验的反思和观察。

### 一、“大院”子弟的成长

“大院”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记忆，它是“建国初期在中国城市发展出来的一种居住模式。50、60年代中国政府将城市居民通过‘单位’进行管理，不同的人群归属不同的单位，同一单位的人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在同一个居住单元内完成，这个居住单元被称为‘大院’”它的主要类型有“部队、机关、学校、工厂。”<sup>①</sup>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形式是建国初集体主义思维在城市空间的直接反映，北京作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有各种级别的单位大院，大院中的居民之间共享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当时，支撑人们集体生活的动力是共产主义信仰。1978年改革开放的种子播满华夏大地之后，经济发展成了主要任务，逐渐生根的是金钱以及资本，市场经济逐渐替代了计划经济，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众多崭新的发展机会，许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院”子弟注定与众不同。

#### （一）逃离与皈依

逃离是人类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一种状态，常见的表现是个体因为某些原因有意与整体疏离，也有一部分个体是被抛弃而逃离。无论怎样，像这种个体与整体的剥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个体精神的一次洗礼，表现的是勇敢与过去告别、拥抱新生活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畅快欢愉，也有过柳宗元“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的无奈自嘲与忧愤。事实上，逃离与皈依是成长的一体两面，逃离连接了现实与远方，经历逃离、皈依，完成成长。然而，大部分作家在最初创作的时候，其灵感大多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于是在文本中便或多或少地掺进一些耳熟能详的生活场景，甚至有的作家在写作生涯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苏联作家米哈伊

<sup>①</sup> 连晓刚.单位大院：近当代北京居住空间演变[D].北京:清华大学,2015:1.

尔·肖洛霍夫自《静静的顿河》到《被开垦的处女地》形成的“顿河系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从早期创作的《红高粱》开辟出的“高密东北乡”、徐则臣小说中不断引用的“花街”等。不得不说，这种文学“根据地”的显现，一方面表达了作家对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揭示了这片土地乃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和创作灵感来源。同理，作家石一枫在创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文学“根据地”——北京。从小在北京部队大院长大的他，目之所及，大多是献身于工作的家长和疏于管教的“问题小孩”。

在石一枫的小说文本中，“大院”子弟总是与纨绔、叛逆等词语划上等号，不满于现状，他们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逃离。这种逃离的行为其实可以找到出处，在鲁迅小说中“离乡——返乡——离乡”的叙述模式中早已呈现过，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时代的生活经验带来了新的文学创作源泉，也带来了新的创作挑战。正如石一枫在一次访谈中提及的，“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在这个时代产生，现在的老人也只能在这个时代产生。我的写作观念很传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见过什么样的人，才敢写什么样的小说。小说应该写点儿实在的东西，作家就是一个常人，不是呼风唤雨的偶像，不是离经叛道的艺术家”。<sup>①</sup>基于石一枫的个人经验，“大院”子弟的这一形象随着石一枫小说作品的面世逐渐活跃于人们的视野：《小调旧时光》（2007）中的荒诞而真实的“我”，《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中叛逆、骄傲的节节，《我妹》（2013）及《心灵外史》（2017）中的杨麦，《恋恋北京》（2012）、《合奏》（2014）以及《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中苦练小提琴未果的赵小提，他们的出现让“大院”子弟这个特殊群体的成长之路公之于众。

其中，《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就是一部详细叙述逃离的文本，小说讲述了北京大院一个“80后”漂亮女孩的青春成长故事，她“聪明漂亮，发育良好，浑身上下透着傲劲儿，整个人灿烂如阳光。”<sup>②</sup>她的出生伴随着声、光、电，这些东西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神奇和振奋人心的。节节的爸爸原是部队大院歌剧团的拉幕工人，妈妈是一名舞蹈演员。大人们在舞台上忙前忙后，小孩子们在台下“忙前忙后”各自成长。不置可否，“成长”一词来源于人类学，指青少年经历了生活的一系列磨砺和考验之后，获得了独立应对社会和生活的知识、能力和信心，从而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成年。这种磨练或考验往往具有仪式性质。<sup>③</sup>在这样充满仪式性的考验中，个体或选择主动成长或选择被动成长，最后，都会交上一份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至于，如何从天真迈向成熟、如何从粗粝迈向文明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也成为文学要讨论的恒常的主题。

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旧体制在岗人工人受到巨大冲击，造成了他们身

<sup>①</sup> 蒋肖斌.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才敢写什么样的小说[N]. 中国青年报, 2017-01-03(4).

<sup>②</sup> 石一枫. 节节最爱声光电[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

<sup>③</sup>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

体和精神上的集体压抑,而压抑恰恰是滋生叛逆的摇篮。《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中节节的爸爸顺应潮流辞去了歌舞剧团大院的固定工作下海经商,因而不可避免地疏离了她们母女二人。母亲需要一人独自面对社会、单位、家庭的多重压抑,一向心高气傲的她将这些压抑深深埋在心里。敏感的节节在这种逼仄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出于本能,她想要逃离这种压抑的环境,于是,有了她无数次的“逃跑”行动。她逃到附近的部队大院,然后发现“每个大院的格局都是一样的:半旧的红砖小楼,更旧的苏式小楼,楼体上缀满了爬山虎。操场的一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另一边则矗立着一个毛主席。毛主席扬起一只手,正在指引方向”而节节对这个指引动作的理解却是“去去去,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sup>①</sup>虽然节节的这种理解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带着戏谑成分的误读,但是,正因如此,可以看出节节在家庭找不到存在感和认同感,无法建立起心理学上所谓的“同一性”。

“一个人的同一性意味着对与‘我’有关和他人有关的自我的了解。”<sup>②</sup>这是一个人关于自我认知的界定方式。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情一直充满怨恨,但到头来却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真正的释怀,因为恨与爱本就是一体两面,相互转化的。当节节发现母亲因为她“艺术家”的尊严而差点瘫痪后,便再也没有办法对母亲继续恨下去,也就没有理由继续逃跑。但是面对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她只能将身边所有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如果自己没生在剧团里,妈妈不是‘艺术家’,爸爸不是‘匪兵甲’,那么也就不会有离婚这回事了吧,再往后也就不会被挑上演员了吧,妈妈更不会因为单脚十周转而摔伤了吧。”<sup>③</sup>这种想法,让她更加讨厌大院剧团的一切,更想逃离这个大院。直到她出发去读大学的时候,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逃离。在《我妹》(2013)及《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中,杨麦和赵小提也是在读大学之后,真正脱离家庭、开始新生活。可是,以为能够拥抱新生活的节节进入大学之后,却阴差阳错做了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这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让节节感受到现实世界的残酷,并逼迫她快速成长。最终,骄傲、叛逆的节节在逃离家庭之后,选择回归家庭照顾母亲。这种逃离之后的皈依无疑是疼痛的,但小说结尾讲到“这个最坚韧又最软弱。最虚荣又最善良、最稚嫩又最沧桑的小女人,便站在那里,笑着,等着迎接她的新生活了。”<sup>④</sup>换言之,这个北京女孩经历数次逃离,终于回到现实,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女人。而《我妹》(2013)中的杨麦离开家庭,日子过得也是浑浑噩噩,直到妹妹小米的出现,他才重新感受到亲人的温暖,逐渐被其感染,完成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70后”是缺少集体记忆的一代,当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大变动都已经落下帷幕,“文革”终结、启蒙时代已过,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的

<sup>①</sup> 石一枫.节节最爱声光电[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26.

<sup>②</sup> J·米切尔著,张进辅译.青春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4.

<sup>③</sup> 石一枫.节节最爱声光电[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31.

<sup>④</sup> 石一枫.节节最爱声光电[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16.

主体基本由经济生活占据，因而他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和意义，内心深处渴望逃离这样一种环境，于是，在创作的潜意识中较多展现逃离命题。“70后”作家魏微在《姐姐和弟弟》中，塑造了一位无情、暴躁、坚硬、敏感而忧郁的早熟姐姐，反抗着来自父母的女人应该贤良温顺的教育，她认为自己需要离家出走，去往城市开启新生活。此外，她在《回家》和《寻父记》中也都设置了逃离家庭的情节，可知，逃离现状、拥抱新生活是作家经常采用的故事情节。同样，另一位“70后”作家徐则臣在其小说更是不胜其烦地涉及逃离，在他笔下，既有负“罪”而逃的女孩秦福小（《耶路撒冷》）、余松波（《王城如海》）、九果（《镜子与刀》），也有厌倦原有生活逃亡到都市的唐小鹰（《暗地》）、胡方域（《居延》）、郑青蓝（《水边书》）以及陈木年（《夜火车》）等等。通过“70后”作家魏微笔下的姐姐以及徐则臣笔下的秦福小等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青年的身上都有着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危机，这也是“70后”作家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人们努力反思自己、找寻未来，以为现实的困境通过逃离就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在逃离的过程中又不断嵌套新的反思、酝酿新的逃离，久而久之，明白逃离不是真正解决之法，唯有大胆面对，当人们能够直面问题的时候逃离和反叛已是过去式，剩下的是便是对生活和现实的皈依。

## （二）孤独与叛逆

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或许可以忍受饥饿、压迫等痛苦，但却难以忍受全然的孤独带来的痛苦。虽说难以忍受，但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的感受孤独。就如作家帕斯所言，“孤独，即所谓感知之孤单，对世界漠然以及同我之离异。”<sup>①</sup>然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孤独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当人们进入到钢筋水泥的都市生活，不再理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鸡犬相闻”时，便心甘情愿接受了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一系列结果。客观的讲，几乎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感受到孤独，并对孤独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成长的孤独便顺理成章进入到文学领域，并成为文学创作的又一母题。如果说“50后”“60后”作家如莫言、贾平凹、张炜、余华、毕飞宇、苏童等作家更多的是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话，那么“70后”作家经历了物质化世界的浸染，更多是向自我转变，关注容易被忽视的个体成长层面。如路内在其小说《追随她的旅程》中，塑造的技校里抽烟打牌、打架斗殴、追女孩儿的小混混们，以及石一枫在《红旗下的果儿》（2009）、《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以及《我妹》（2013）等小说中反复呈现的吸烟、酗酒、“拍婆子”、“茬架”的“顽主”们，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小孩”“潇洒”的背后，是成长的孤独。他们三两个成群，通过一些自认为很霸气、潇洒的行为，来弥补内心孤独的空缺。实际上，在“大院”中生活，各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食堂、小商店、操场、楼房等生活元素齐全，各家各户在属

<sup>①</sup> [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帕斯作品选[M].赵振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64.

于自己的场域里生活，邻里之间的交际较之农村而言要陌生的多，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孩，大多物质生活富足，精神世界孤独。

不可否认，每个人对童年的印象都颇为深刻，而童年的经历也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由于代际的原因，“70后”作家将“80后”的成长尽收眼底，笔下的人物形象也较多涉及“80后”，客观的讲，“80后”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批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虽然他们从小物质生活优越，但没有兄弟姐妹相伴，导致他们内心渴望陪伴而现实中却又不得不忍受孤独的现状，这样的情景往往很直观地呈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事实上，在石一枫的小说中，很容易发现童年生活环境对一个人人生轨迹的影响乃至改变，他笔下人物的所有喜怒哀乐，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石一枫对童年时期的记忆是他“一个人在林荫道上踽踽而行，口齿不清，念念有词，神魂颠倒。”<sup>①</sup>这种儿童时期孤独的感觉让他对周围的人和事格外敏感，可以说，正是这些独处的方式和孤独的经验打开了他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所有器官，将这些独自成长的记忆保存，在某个不经意的创作瞬间，将这些画面自然地流露到作品中来。石一枫在短篇小说《合奏》（2014）中塑造的学琴少年赵小提，每天形单影只的去母亲租来的房间里练琴准备考试。他的这种成长模式可以说是许多“大院”子弟共通的成长模式。在《合奏》（2014）短短17页的文本中，“孤独”一词就出现了7次，表面看来，小说《合奏》（2014）仿佛是两人或者多人的共同演奏，但事实上，小说却将这次合奏描绘的分外难得和珍惜，借此呈现“大院”子弟在青春成长路上的孤独感。小说中写到，“‘琴童’们大多活得极其封闭，互相之间没有交往，就是在同一个老师门下学习的孩子，赵小提也一个都不认识。但在他心里，这些人却比其他同龄人熟悉得多，也亲近得多。他们都在忍受着同一种孤独。”<sup>②</sup>也即是说，一起学琴的孩子们未必是真正的琴童，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去学习这门“特长”，换言之，家长“帮”孩子做了许多人生路上的决定，让孩子们课余时间变得“丰富”，各种艺术班侵占了本应与父母、同伴交流和玩耍的时间。一方面，这些孩子要面临独生子女的孤独，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父母人为制造的孤独，这些都导致了他们性格上的封闭、精神上的孤独。

然而，从小生活物质生活条件富足的这些“大院”子弟，他们的父母往往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关注孩子的成长，彼此之间缺少交流沟通，因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对立、冷漠、甚至是厌恶的，成长过程中的孩子就容易表现出叛逆情绪。石一枫在《五年内外》（2019）这部作品通过串联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故事，将他们身上的叛逆展现得一览无余，有经常自残的大姐、喜欢吃昆虫的小哑巴、无法直行的“螃蟹男”，还有用大皮鞋虐待父亲的地痞流氓鲁泡儿，其中鲁泡儿就是将父亲小时候对自己的“狠”化成了对父亲的“恨”，以此要叛逆报复父亲。石一枫用这样一种极端的父子关系呈现了那个时代两辈人之间深深的隔阂。此外，

<sup>①</sup> 石一枫.不准眨眼[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299.

<sup>②</sup> 石一枫.合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123.

小说开篇谈到上大学前“我无所事事，对未来的梦想鼠目寸光，只想当一个成功的地痞流氓——谁敢和我照眼儿，我就用大皮鞋的跟打爆他的头。”<sup>①</sup>石一枫在多部作品中塑造的男性都有过这种“痞子梦想”，他们借以这样的方式彰显自己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的存在感，实质上就是一种通过反人伦、反道德、反常规的叛逆弥补内心的孤独并且以此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感。苏联著名文艺评论家巴赫金对于成长类型的小说一直倾力研究，在其著作《小说理论》中认为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并对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了界定，“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sup>②</sup>也即是说，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进步，人类的成长也日渐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特点，成长小说主要关注人物成长过程，以此来达到作者反映现实的目的。众所周知，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一个个的事件串联在一起，协同推进个体的生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心理学中将 10-17 岁定义为青春期，也就是科学意义上个体的成长阶段。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个体之间的成长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一些早熟、敏感的个体在 8-9 岁就已经开始“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一些 18-25 岁的个体，也就是被定义为青年阶段的人，却大多还在求学、求职的路上，其生理特征虽然成熟，但精神世界或者心理世界并未实现真正的成长，对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理解也处于一种相对无知或者迷茫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些个体虽在年龄上已被界定为成人，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人的转变，那么对于成长而言，只关注心理学上的“青春期”阶段是片面的，还应该关注到现实生活的复杂多面。不置可否，阅读“70 后”的小说，扑满而来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气息，尽管这样的写作带有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的特征，但是蕴藏在作品中寂寥情绪、孤单的心灵感受对于人类的成长过程而言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孤独与叛逆的背后蕴含着难得的真实。

## 二、异乡漂泊者的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城市的飞速发展，大量的资本和发展机会都聚集在此，致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向城市汇聚，他们怀着梦想从故乡来到异乡，漂泊成了参与社会人生的常态。而在漂泊的过程中，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和成熟，身体和心灵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70 后”作家的笔下，许多异乡漂泊者往往是主动选择了漂泊的姿态。魏微在《拐弯的夏天》里，写到北上求学的男孩遇到“阿姐”后，就过上了漂泊的日子。路内在“青春三部曲”中，描绘了路小路爱上“厂花女神”白蓝，进行了短暂而又轰烈的爱情后，意识到自己缺少白蓝身上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然后踏上去西藏的列车开启了漂泊之旅，当然，

<sup>①</sup> 石一枫.五年内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57.

<sup>②</sup>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0.

也是自己的成长之旅。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中耗费巨大篇幅涉及到异乡漂泊者的成长。可见,“70后”作家无意于漂泊的结局,更多的是放大漂泊的意义来关注其漂泊过程中心路历程的变化,而这些恰好是现代社会个体成长的精神养料。

### (一) 形象与性格的变化

随着大众传媒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渗入,人们对异乡的想法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城市对于人们来说,不再是物质上的满足,也意味着生存方式的改变和文化上的享受。作家通过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群异乡漂泊者,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农村,甚至是较为穷困的边远地区的青年人,他们凭着学历和能力,在大都市里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有了温饱,但是经济的拮据,环境的隔膜,情绪的孤独,欲望不能满足,都成为折磨他们的新问题。”<sup>①</sup>在这些问题的驱使下,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改变。对于异乡漂泊者来说,他们向往城市生活的丰富与便捷,而实际上真正融入城市的门槛并不低。在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中,主人公陈金芳是一个不愿回归乡村,但又融入城市未果的人。她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到北京;第二阶段,初中毕业后傍上地痞流氓;第三阶段,艺术投资变身“上流人士”;第四阶段,非法融资失败回归农村。

第一阶段,初到北京。也就是初二时她随着家人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那段时日,她“个子很矮,踮着脚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sup>②</sup>“一年四季的换洗衣服不超过三套,一件洗了另一件可能还没干,必须穿着湿的来上学”。<sup>③</sup>因此,遭到同学们的集体排挤。她的姐姐是部队大院食堂负责打菜的,姐夫是食堂的厨师,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再要供养陈金芳和她母亲,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他们什么都吃,这让班里的同学更加排斥她。当陈金芳家里发生变故,家人要回湖南老家时,陈金芳却不愿意离开北京,付出惨烈的代价最后留在了北京。由于先天的爱美之心,她拿烙铁烫过头发,偷穿她姐的垫肩西服,还成了班上“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第一个到批发市场小摊儿上穿耳洞的。”<sup>④</sup>她拿自己的脸不断做实验,什么都涂上去尝试一番。但是这样的陈金芳在学校说的话加起来也没超过十句,可想而知,她当时尽管张扬个性,却十分腼腆内向。

第二阶段,初中毕业后。她泼辣、妖娆、轻浮,成了各色地痞流氓的“圈子”,靠他们“带着”生活。跟着流氓“豁子”时,她“没见识、上不了台面儿,脑子也笨,甚至还不讲卫生。”在服装生意失败后,仍然“逛商场、吃西餐,每逢北

<sup>①</sup> 陈思和.甫跃辉的小说创作[N].文学报,2016-1-7.

<sup>②</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9.

<sup>③</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6.

<sup>④</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6.

京有小剧场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死磨硬泡地让豁子给她买票。”<sup>①</sup>她自认为出入这样的高档场所就能洗掉自己身上的乡土气息，能够摆脱异乡漂泊者的身份真正融入城市，但事实上，这种依靠男人获得的一切都过于飘渺。

第三阶段，十几年后的现在。陈金芳摇身一变成了“上流人士”，“我”在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第三次来华的音乐会上与她偶遇。她成了“三十上下的年轻女人，妆化得相当浓艳，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卡地亚丝巾。”“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显得端庄极了。”<sup>②</sup>还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予倩”。后来在一个画家的个人展览上，陈金芳成了“有分量的人”——艺术品投资商，她“穿着一件纯白的雪貂短大衣，头发像宋氏三姐妹似的在脑后绾了个髻儿，正热络地和一个核桃般满脸皱纹的男人聊天。”<sup>③</sup>陈金芳已经不是那个带着乡土气息的内向的女孩了，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现在已经“很热衷于自我表达，并且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sup>④</sup>

第四阶段，美梦幻灭。陈金芳非法融资失败，自杀未遂，回归农村，这时的她既没有青春的本钱，也没有资金周转，还触及法律底线，可以说她异乡漂泊者的身份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而现如今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通过陈金芳在北京漂泊所经历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得知，他们越努力地想要融入城市，却越容易暴露自身性格方面的问题，那么产生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恰好是他们自己在城市中奋力成长的过程。学者赵园曾说，“上海和北京被分别作成外延大于内涵的概念……它们在普通人那里的情感属性和它们因文学艺术的加工制作而引发想象、联想的丰富的审美品行。”<sup>⑤</sup>由此可知，城市对青年群体而言，不仅是追逐梦想、寻求个体意义的地方，更是诗意的理想栖居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靠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来迎接成长过程中的顿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陈金芳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性格悲剧，二、时代悲剧。事实上，每个少年在成长之路上，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不公正对待，有的是对身体缺陷的嘲讽，有的是蔑视贫寒的家境，这些对于青春期孩子的性格所造成的影响巨大。可以说，这种由自己同学或者成长伙伴带来的伤害是超乎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灰色的记忆将会成为永远的秘密埋藏于内心深处，不经意间，在某些场合或特定情境下，便又会浮出水面。另外，由于这些遭遇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个体以后的人生选择和是非判断。陈金芳正是因为因为在青春期最为敏感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造成了性格上的极度自卑，从而导致了一种无形的身份焦虑一直伴随着她。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青春期的第二次发育，这期间，青少年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转向成年阶段，普遍

<sup>①</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019:38.

<sup>②</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4-5.

<sup>③</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45.

<sup>④</sup>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49.

<sup>⑤</sup> 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6.

都会产生苦闷和困惑，这些异乡漂泊者远在他乡，父母疲于奔命，缺席孩子的成长，缺少正确的教育与引导的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向另一种人生。身处资本横行的时代之中，金钱可以满足陈金芳儿时压抑的所有欲望，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她尝试着快速的“赚钱”之路——“傍大款”、摆小摊、搞投资，当她沉迷于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快速换取“晋升之道”时，她的所有努力注定是一场悲剧。尽管她的执念不过“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sup>①</sup>但毫无疑问，这种畸形的世界观最终会导致陈金芳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梦想破灭。小说巧妙地通过“我”的眼睛看到陈金芳的在漂泊过程中形象的改变及性格的变化，将她的成长轨迹跃然纸上：由最初内向的农村女孩到成为女顽主，再到优雅得体的成功女商人，到最后成为一个自杀未遂的破产商人。她的成长经历是众多异乡漂泊者的缩影，不难看出，她的成长在时代重压下只剩下一副倔强的姿态。

## （二）隐喻式成长

乔治·莱考夫等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sup>②</sup>如此可知，动物小说中的成长也可作为人的隐喻，即通过动物的一些行径，表达充满意指的内涵。石一枫发表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上的长篇小说《白熊回家》中，呈现了发生在北极熊身上的有关成长的故事。事实上，石一枫自创作以来就一直关注个体的精神成长问题，如《心灵外史》（2017）中的“我”虽是一个“焦虑症”患者，但经历了对大姨妈的拯救，其实是完成一个如凤凰涅槃一般的自我拯救、自我成长的过程；《营救麦克黄》（2016）中的颜小莉看清了黄蔚妮的嘴脸，不再与其同流合污，宠物狗“麦克黄”丢失又找回的过程就是颜小莉的个人精神成长之路。然而，石一枫的近期作品《白熊回家》（2020），表面上看起来，仿佛换了思路，写了一部动物小说，但是细心地读者都会发现，小说虽采用动物叙事、动物寓言的方式，其本质上并没有抛弃个体的精神成长主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仍然可以看做成长主题的小说，只是采用了隐喻的方式，用动物的成长之路来隐喻人类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成长小说中的情节发展大致有共通的模板，即经历“无知——迷茫——出走——磨难——成熟”这样的过程。一般而言，小说主人公对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是陌生且充满好奇的，渐渐地，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常理和规定之后变得迷茫，然后经历出走、面临各种类型的磨难，最后心智成熟、可堪重任，适应现实生活。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小说永恒的真理就是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因为“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sup>③</sup>每个小说文本一旦面世，就意味着它拥有了丰富的可阐释空间。《白熊回家》（2020）这个故事

<sup>①</sup> 石一枫. 世间已无陈金芳[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 100.

<sup>②</sup> [美]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sup>③</sup> [捷克]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4.

模板虽然看起来未能脱离成长小说的模板，但这种模板却被许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奉为圭臬、屡试不爽，因为这种模式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能够带给读者视听上的享受，提供一种供读者栖居的异域，引领读者走向小说的更深层意蕴。《白熊回家》（2020）的叙述就完全符合这样的模式。主人公熊小黑因皮毛是黑色，自生下来就被当成异类，面对白熊族群中投来的异样眼神，他并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显示出一种“无知”的状态。当白熊家族要教给小熊们捕鱼的生存技能时，因熊小黑的肤色太显眼，鱼群看到不敢浮出水面，导致白熊们半天没捕到鱼；除了学习捕鱼，小熊们还要学习打架，这些东西都让熊小黑感到迷茫，因为他的肤色，即捕不到鱼也没办法去偷袭别人，所以它逐渐变得“迷茫”，不知道生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当熊诗人成为它的老师后，熊诗人给熊小黑讲了许多“邪恶的世界”——人类世界中的一些事情，更是让它经常感到不解，由此加深了对生活的“迷茫”。正在它处于迷茫的时候，偷猎者来到了北极，发现了这群北极熊，然后，将它们当中年轻力壮的悉数带走，准备运往人类社会的动物园狠狠地赚一笔。于是，熊小黑经历了被“出走”的过程。但是在偷猎者们在海上的运输过程中却遭到了意外死去，船也在意外中漏水，熊小黑在船上与动物研究专家“煤球老爹”学习了知识，带领大家把木箱子绑在一起做成“大船”逃生。也就在这时，邪恶势力的代表熊独眼却在夜晚熟睡的时候，割断了熊小黑和熊白白的箱子，让它们自生自灭，在海上经历了种种“磨难”，饱尝漂泊之苦。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冰雪组成的陆地上，原来它们从北极出发顺着洋流飘到了南极！然后，发现熊独眼带领着白熊们充当了侵略者的角色，占领了南极，建立了“白熊帝国”，并奴役了南极的“土著居民”企鹅。由此，激发了熊小黑内心的正义感，在推翻熊独眼的谋划中，它逐渐“成熟”起来，尽管在异乡漂泊，但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放了企鹅，营救了白熊家族，获得了信任，并带领白熊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北极。不难得知，这篇小说的叙事动力来自熊小黑不断提升的认知水平，在经历了一定的挫折和困难之后，认知渐渐提升和完备，犹如人在社会中经历困难和艰险之后的那份老练与沉稳。

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理想的乐园在异域，都要去追寻，但熊小黑在经历过这次被“出走”后才真正明白“这个乐园也许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就最终能在自己的手中找到它。我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家乡变成那样一个乐园。”<sup>①</sup>通过这次充满“成长”意味的熊生历练，熊小黑认识到，对一个漂泊者而言，回到故土才能更好地找准定位，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当然，人也不能盲目漂泊，惟有找准自己的“根”在哪，才能真正成长，成就一番天地。在小说中，作家没有大肆宣扬所谓的“动物法则”“弱肉强食”等野性的生存规律以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而是一以贯之地强调熊小黑身上所具备的正义感、熊白白身上善良、纯洁的品质，以及亲情、友情、师生情等各种情感在困

<sup>①</sup> 石一枫.白熊回家[J].人民文学,2020(6).

难和磨难面前所激发出的无穷力量。不难看出，作家石一枫对人类生活仍然是抱有积极期待的，并且对于个体的成长也是充满温情与关怀的。就如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塑造的赵亚丽形象一样，在经历了种种困难，眼看着马上一无所有的时候，她仍然能够秉持心中的那一份道德和善意；而《心灵外史》（2017）中的大姨妈看似盲信和无所适从，但是她对“我”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的态度却无比宠溺与温柔，填补了“我”成长过程中亲情的空白，推动“我”的成长。《白熊回家》（2020）借助隐喻的形式，展现了个体由“在地——漂泊——回归”的过程，这恰好是现代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成长模式，只不过现实中的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在城市“蜗居”，一部分闯荡失败，回归乡村。只不过《白熊回家》（2020）表明了作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冀和期望。总而言之，像这种对个体精神成长的关注是石一枫创作的艺术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作家对人类文明的美好期待和社会进步的愿望，同时也着力于博爱与顽强的毅力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谈及，“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sup>①</sup>石一枫的作品也是一样，他在作品中并没有丢掉他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那就是对个体精神成长之路的用心与极大关注。在这一层面，石一枫这部长篇小说《白熊回家》（2020）的创作风格与先前的《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心灵外史》（2017）《营救麦克黄》（2016）等系列作品中的写作风格仍然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石一枫的这部长篇小说《白熊回家》（2020）从动物的视角，赋予动物以人的情感、思想，从动物的角度去感受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和人情冷暖，让原本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动物的身上，可以说，具有较强的阅读冲击性，尤其是作品中一些动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十分细致入微，作家借助这种方式，促使人们进行反思。小说运用寓言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述北极熊与北极熊之间的家族之分、伦理之争，以及“白熊帝国”的建立、崛起、灭亡的过程，实际上是从人与动物的双重角度映射、反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有的作品还将动物的“兽性”与“人性”相对比，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与自我迷失。

总而言之，我们不难想象，动物小说的蓬勃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它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人类自身，动物在自然界中也具备主体性地位，警醒人类不要再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和无知。或如2020年突发而肆虐的新冠疫情，原先散漫而自由惯了的人们不得不在家中自我封闭，与此同时，许多红外摄像机却测到了很多动物在大自然中悠然自在地生活，这也表明，没有人类的“关心”，动物们反而活的更加自由自在。正如小说《白熊回家》（2020）中的动物研究专家煤球老爹得出的结论，“企鹅和白熊并不拥有智慧，他们只是头脑简单的动物。他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人类并不应该只会研究动物，还应该为他们着想，因为人类自己也是一种动物，他们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都需

<sup>①</sup> [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要别人的尊重。”<sup>①</sup>由此可见，人类自身需要被尊重，动物亦是如此。另一方面，许多作家关注到生态问题，创作了许多的动物小说并呼吁世人关心人与自然，这从侧面反映了人类在有意无意中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人类世界之外的东西还是时刻保持观照与重视的。虽然人也是自然之子，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反思，而这部分动物小说恰恰能够激发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系列现实问题，并借以希望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让所有的动物都回到自己的家园。

---

<sup>①</sup> 石一枫.白熊回家[J].人民文学,2020(6).

## 第二章 社会问题剖析

虽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文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仍以惯性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70后”作家石一枫仍在承传和延续着上个世纪初叶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问题小说家们关注时代、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以饱含时代感和丰富情愫的文字再现当今时代的诸多社会问题。批评家孟繁华认为“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复杂的情节、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呈现我们内心深感不安、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sup>①</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石一枫接过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重担。然而，社会问题小说可以说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比较独特的一种，这种类型的小说讲求探究其思想性而非艺术性，目的就是讨论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背后的多重含义。事实上，石一枫近几年佳作频出，而且随着作品的不断面世和创作经验的丰富，他的创作风格以及脉络也随之清晰起来。其中石一枫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刻画来针砭当今时代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以此展开小说叙事。

### 一、再现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石一枫在早期创作中，主要关注个体的青春成长故事，随着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增加，开始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汇聚起来形成文本，以供当代人集体反思。可想而知，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人都想通过勤奋的双手改变自己“泥腿子”的出身，在这追梦的路上，自然会有城乡差异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然而，时代的冲击回应到每个独立的个体身上，都是致命一击，在文学领域，也就有了人与城的异化主题出现，人们为了在城市中的生存，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比如以陈金芳为代表的出卖身体的女性。另一方面，尽管一部分城里人搭上了城市化进程的快车，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但是仍然不能过得安逸，就像《特别能战斗》（2016）里的北京大妈一样，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才心安。最后，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时代的车轮总是不停转动，社会的发展不会为哪一个人而停留，如若跟不上主潮流，偏听偏信，则会像《心灵外史》（2017）中杨麦的大姨妈一样，一步错步步错。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方面中国农村向城市（镇）转化的速度加快，形成了特大城市、中心城市、特色小镇等城市化结构的多样层级与交叉次序。而在这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本有的管理体制与社会秩序遭遇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城市固有的管理体制及社会公共设施严重滞后，尤其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最为鲜明。一方面，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们，不论身处城市哪个角落，他们必将面对陌生的生活、

<sup>①</sup> 舒晋瑜.石一枫：用繁复的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N].中华读书报:2017-08-09.

工作环境，他们要从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迈入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存生活环境，如何融入这种环境并能够活下去，对这些人来说，是摆在面前最直接、最无法回避的直接问题与现实挑战。而另一方面，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们，由于之前的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严重缺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身俱来的饱含乡村特质的传统思维、与人相处及打交道的固有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他们在城市里“自由而自主”地施展拳脚，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为之奋斗的“城市”，从而造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始终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或生存的艰难境地之中而无法逾越。

事实上，“农村青年进城”这种叙事类型可以说并不陌生，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直被反复书写，“从路遥到方方、东西、石一枫等作家，他们关注着现代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流动、融合问题，以青年进城作为叙事切口，打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在近四十年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暗区。”<sup>①</sup>。而那些试图通过“进城”及进城后个人的奋斗来完成命定人生“大逆转”的进城者，比如陈金芳、涂自强等，他们怀揣梦想“进城”却遭遇种种挫折——要么经受不了事业家庭婚姻等接二连三地的打击而心灰意冷、慢慢堕落下去，要么迫于种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最终又不得不回到曾经生他养他，也给过他温暖的黄土地。毫无疑问，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悲剧和城乡矛盾已经远远超过了青年的个人悲伤，而是具有某种社会性和群体性的特征，彰显着时代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普遍困境。每当人们在阅读和细品他们各自多舛的命运和卑微的人生之路时，不仅惊叹于城市与乡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的隔膜与陌生，同时也惊讶于即便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如今的规模与深度，“进城”仍是个极具魔幻般的存在，尤其如同北京城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大量游走于城市边缘的人们、尤其是怀揣“城市梦”的年轻人。石一枫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倾力塑造的王亚丽、郭立成和岳晓芬等——这些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面临着“生”的艰难和“活”的无序与尴尬。

### （一）边缘化职业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导致身无长技的农民工只能委身于边缘化的职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导致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的劳动力缺口，但是从农村涌来的这些劳动力远远大于这部分空缺，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力剩余，漂泊在城市中，尤以年轻农村女性为主。她们往往没有完整的知识结构，没有强劲的体力和耐力，只能转向餐饮、发廊、家政、娱乐休闲等服务性质的职业，虽然工作量大、工作辛苦，但由于这类职业的准入门槛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所以求职竞争也较为激烈，薪资报酬也不容乐观。石一枫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

<sup>①</sup> 沈杏培.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J].扬子江评论,2018(5):77.

中，塑造的主人公王亚丽和“团契”发起人岳晓芬都属于这样的进城务工女性。王亚丽凭借在健身房跳操赚取微薄的收入，不得不说，“健身房”这个代表现代都市的特殊意象，汇聚了这座城市大部分中上水平收入的人，王亚丽听到健身房的客人们开玩笑一般面对炒房炒股七位数的亏空，而在此工作的王亚丽在每天大汗淋漓后，却只能坐在路边盯着时间等待自己的半价法棍，将自己的生活开支精确到个位数甚至小数点后一位数。城市就在自己眼前，自己也身处城市之中，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咖啡馆，有经营各种没用的小玩意儿的文创商店，有上演‘不插电音乐’和‘无台词话剧’的酒吧书吧”<sup>①</sup>，这里是王亚丽心中的执念。而“团契”成员岳晓芬最初也是作为“新城市人”在北京打拼，后来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却因拿不出医药费而作罢。岳晓芬本想努力工作赚取医药费，然而待遇好的单位进不去，而工资高的地方大多是“九九六”的工作模式，还需要熬夜加班，她的病无法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最后只能去花店站柜台。无论是健身房工作还是花店零工，在城市里都属于比较边缘化的职业，这种边缘化的职业必然导致她们的身份和地位边缘化。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劳动力进城确实缓解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也为城市建设做出极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进城后的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也很难适应自己在城中的“异乡漂泊者身份”。他们在城市里只有居住身份，没有居民身份，不能享受居民待遇，相反，他们从事的服务业不仅容易受到城市居民的误解和歧视，还容易被乡下人瞧不起，称他们为“打工仔”“打工妹”等，这直接导致这部分处在城与乡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漂泊者群体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产生认同危机。此外，处于夹缝中的农民工或者说“异乡漂泊者”，他们的社会保障也面临边缘化的处境，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王亚丽受伤后，健身房领导以害怕她的伤口流血吓到客人为由，禁止她去上班，实质上却是害怕她在跳操课程中出现什么问题算作工伤讹钱，我们不难从这一处细节，发现“异乡漂泊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尚需完善。

## （二）边缘化生存

边缘化的位置导致她们在城市中生存困难，物质水平拮据，精神世界也十分贫瘠，更容易误入歧途。客观地讲，“那些紧紧勒住时代绳索不择手段向成功顶峰攀爬的人，如陈金芳、李牧光、黄薇妮等，实则成为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成为诸种时代问题的化身。”<sup>②</sup>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岳晓芬身患先天性心脏病，却因没钱而放弃治疗，就在此时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基督教，“主”的善良让她焦灼而又空白的内心有了依靠，于是她成立团契，接收和她命运相似的“老弱病残”，在这陌生的城市彼此抱团取暖，希望借此麻痹自己的大脑，全靠信仰支撑自己活下去。直到看到王亚丽暂存在她卡上的十万块钱才又动了做手

<sup>①</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sup>②</sup> 李彦姝.何谓同时代人?——以石一枫都市批判小说为中心[J].小说评论,2018(5):169.

术活下去的念头，于是，她拿着王亚丽的钱去做了手术，结果却因手术后的排异反应严重转入ICU进行监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岳晓芬看到“债主”王亚丽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对不起主。”显而易见，尽管自己曾经被网上流传的“穷传教”“苦传教”的虚假信息骗过钱，但是在王亚丽的心中“主”仍然是自己的精神寄托。

作家石一枫正是通过这一件件的小事揭露出进城打工青年的种种不易，可以看出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之细微，揭露之精准。不言而喻，城市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活方式、先进文化、先进科技的代表，吸引着大量民间资本和民间劳动力，然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日益提升，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对就业者的知识、技术要求也水涨船高。但是大量的异乡进城者虽然面临生活窘迫的处境，仍然一心向往城市，将城市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往往让人失望，这使得新世纪小说创作中，城乡之间的问题不断涌现，主要原因不外乎社会阶层固化、社会资源城乡分配不均，导致一部分有志识的底层青年涌向城市，而进城后又很难打破固有阶层真正实现在城市扎根生存。这个问题上，许多作家都感同身受，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涂自强从山沟考到大学，从乡村来到城市，开始了他的漂泊之旅，他并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是想豁出命去打拼，结果却遭遇老板跑路、母亲受伤等变故，受到挫折后，涂自强并没有抱怨社会不公，而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最后只得靠宗教来填补内心的空白。毫无疑问，涂自强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大量贫寒子弟进军城市未果的缩影。单单是在城市中生存，就已经耗尽了这些青年的所有创造力和活力，他们只能接受进不了城市也回不了家乡的尴尬处境。

如果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要探讨新世纪底层的知识青年从“一个高度资本化、商品化、市场化、世俗化、物质化的时代，在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日益猖獗的过程中，失去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在商业化的逻辑中亦步亦趋，沦为现实的‘庸常者’”<sup>①</sup>的话。那么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则代表着更加普通的底层小人物的彷徨与无助，她不再有“庸常”的表现，而是妄图采用非法手段打破社会阶层壁垒来融入社会。虽然涂自强和陈金芳都来自农村，但是进城方式却不一样，涂自强是考大学作为知识青年，名正言顺地进入城市，而陈金芳是靠着与家人的顽强抵抗，“名不正言不顺”地留在城市。涂自强能够独立劳动，而陈金芳只能通过身体和骗的方式来获取一定的物质条件。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城方式，却获得了近乎一样的结局，都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一个最终罹患肺癌，一个最终被送回老家。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则对底层青年在城市的边缘化生存探讨的更加深入。他们代表的是既是个人悲伤，也是进城者的群体悲伤，更是社会之悲伤。

<sup>①</sup> 袁文丽.城乡结构裂缝中的底层叙述——以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考察对象[J].中国文学研究,2016(4):101.

## 二、精神困境

### （一）信仰的困境

石一枫在不断进行文学尝试的同时，也关注当下人类面临的一种集体困境——信仰缺失，而信仰缺失的主要表现就是“失败者”或者“多余人”的呈现。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sup>①</sup>纵观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恰好印证了昆德拉的这句话。石一枫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这种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抱着一种自嘲或者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间”，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严肃理论都可供调侃，所有的人伦情感都可以怀疑，所有的功名都可供嘲讽。正如学者陈福民所言，“他们顽固持守着一些不明所以、不可理喻的信念，貌似在一塌糊涂的泥浆里打着滚而又努力抬头仰望着什么。”<sup>②</sup>石一枫面对这样的人物有着难以言说的自觉。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信仰文化的欠发达，当代中国文学信仰力量匮乏，信仰书写面临着被忽视的困境。”<sup>③</sup>而石一枫却在《心灵外史》（2017）中对话信仰，在文学层面提出一种叩问信仰的维度。小说通过“无所事事之徒”杨麦的眼睛，看到大姨妈接连几次陷入“盲信”：气功、传销、全能教等。杨麦每次都想站在“高处”对大姨妈进行拯救却未果。而自己明知李无耻大张旗鼓宣扬的“分享信仰”是坑蒙拐骗，仍然投资加入，最后血本无归。事实上，这些有关信仰缺失问题的产生，可能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在石一枫的小说中这些问题的指向都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这就使得石一枫的创作带有一种社会问题意识的自觉性。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肆虐的“气功热”，显然，石一枫对这件事情并未亲身经历，而只是通过各种渠道的了解尽可能在作品中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但是他却能通过娴熟的写作技巧将少年的杨麦设置成“带功报告”的参与者，他看到前来参会的各地“功友”蜷缩在政府大院门前廉价的招待所中，他们煞有介事的运气和彼此安慰在石一枫的笔下带上了一种莫大的讽刺意味，而讽刺意味最强的就是“带功报告”却不知为何被安排在政府的礼堂，这一情节让所谓的信仰缺失，更具讽刺效果。从这一层面得知，就像石一枫在访谈中提到的，“《心灵外史》（2017）本质上仍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sup>④</sup>而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潮流，主要是在“五四”时期，广受追捧，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受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及“纯文学”的影响，社会问题小说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新世纪以来，不少作家有感于中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又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回归社会问题小说。

<sup>①</sup>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sup>②</sup> 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N].文艺报,2011- 11-07.

<sup>③</sup> 张小霞.信仰叙事新篇章——读石一枫的《心灵外史》[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7):6.

<sup>④</sup> 舒晋瑜.石一枫：用繁复的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N].中华读书报,2017-08-09.

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心灵外史》（2017）来看，国人的这种“盲信”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价值观的交杂、混乱、冲突和矛盾所导致的。尤以普遍没文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妇女、进城务工者等等，当他们遭遇到不可逾越的天灾人祸之时，往往就会像《心灵外史》（2017）中杨麦的大姨妈一样，妄图通过迷信于民间各种神神鬼鬼的存在、非法传销等以寻求个人内心的平静和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特别在《心灵外史》（2017）的结尾处，当“我”给心理医生彭佳亿打通电话时才意识到，“我”才是那个需要大姨妈来“救赎”的人。可见，涉及人的精神层面问题“似乎最终达到了某种统一，不论是‘盲信’抑或是‘无信’，其实都是当下国人心灵荒芜的一种表现而已。”<sup>①</sup>石一枫近年来的创作指向，多是直面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与他的“科班出身”和工作性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二）道德的缺失

除《心灵外史》（2017）触及到当代社会中许多人的信仰缺失问题外，中篇小说《地球之眼》（2015）也是回归现实主义的力作。学者师力斌认为《地球之眼》（2015）与《那儿》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样，“《地球之眼》（2015）也是控诉、是悲情，但它更加复杂，更圆润。”其复杂在于“它不仅揭露出了安小男所代表的‘屌丝’们的病苦，还揭露出了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不仅富人李牧光心狠手辣，穷人安小男也绝不心慈手软。对立双方没有胜利者，穷人、富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恰恰是小说悲剧的地方。《地球之眼》（2015）围绕三个男人——庄博益、安小男和李牧光展开，安小男与李牧光的人生之路比涂自强更有概括性，因为安小男属于“屌丝”的代表，虽然是电子专业的高材生，但是仍然面临苦苦挣扎、走投无路的困境。而李牧光则随心所欲、坐享其成、高枕无忧。安小男在生活中无奈沦为“校漂”，机缘巧合下靠着帮学生考试赚取外快，但他“每次从考场出来拿到钱，都要苦口婆心地把考试题目向对方讲一遍，然后再进行一通思想教育：‘连这都不会，你对得起父母吗？’”<sup>③</sup>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安小男在生活中对道德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这部作品看似是描写青年群体的奋斗史，实则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其中小说揭露了毫无节操的高校教授、毫无原则见利忘义的学校、弥漫腐败气息的社会等，在安小男的道德抗争之路上，校友是敌人，教授也不是战友，就连睡在隔壁的曾经的兄弟也转身成了卧底，于是安小男在道德缺失的时代注定孤立无援，他的悲剧既苍凉又荒诞，反映出了当下社会人们不顾道德和伦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引人深思。

事实上，曹征路的《那儿》、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徐则臣的《耶路

<sup>①</sup> 威萌.《心灵外史》：文明进程下的心灵之殇[J].小说评论,2018(1):185.

<sup>②</sup> 师力斌.安小男的性格悲剧和小说新趋势——读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J].2018(3):32.

<sup>③</sup> 石一枫著,孟繁华主编.世间已无陈金芳[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54.

撒冷》以及石一枫的《地球之眼》(2015)都关注到了人的精神困境层面,他们记录着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创伤。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精神问题,这也许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创作性所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比如监控技术的发展,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道德上的困扰,技术面前,没有人一直是得利者,也没有人一直是失败者,大家可能都会变成那个突破道德底线的人,这是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精神症结。

### 三、动物叙事视域下的“人性”反思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开始寻求更高的生存质量及生活水平,继而细化了自身对自然、对社会的现实体验和真切感知。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亟待重新思考与定义;另一方面,尊重生命、保护动物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一系列动物叙事作品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主要是通过“对动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述这些有关动物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进而更加深入到对社会、文化、人性等更深层面上的探求。”<sup>①</sup>诸如叶广岑的《黑鱼千岁》《老虎大福》《狗熊淑娟》《熊猫碎货》、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猎人峰》、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狼图腾》、郭雪波的《银狐》等作品,要知道这些动物叙事作品的出现,除了给人类提供一种另类视角观察世界之外,也为人类敲响了生存危机的警钟,同时,也提供了反思自身不良行为的空间。

作家石一枫刊发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白熊回家》可以说又是动物叙事中的一篇力作。这部小说在题材选择上避开了狐、狼、虎、豹等常见动物小说中的“主角们”,转而选择了处于极寒之地的北极熊,从北极熊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星球的运转,可谓是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为万千读者展现了异域中的“动物世界”。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小说永恒的真理就是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因为“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sup>②</sup>对于创作者来说,昆德拉的这番话极具箴言般的启示作用;当然,动物叙事也不例外。动物叙事的主体首先需是“动物”,而后才是“叙事”,采用的是“‘叙述’+‘故事’”模式,“在此,作为言语行为的‘叙述’和作为该行为的‘语义’流的‘故事’,是两个重点。”<sup>③</sup>这就意味着,动物叙事要以动物为主人公,站在它们的立场或角度去思考或看待问题,体会它们的生存环境以及内心世界,揭示它们的性格命运,关注到动物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生态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继而将“兽性”与“人性”彼此对照,以此展开进一步的文学创作。

<sup>①</sup> 陈佳翼.“动物叙事”中的人文情怀——新世纪动物小说类型化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7.

<sup>②</sup>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4.

<sup>③</sup>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

## （一）人与自然之关系

“自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之前在改造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身行为的不断失控和无序,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sup>①</sup>换言之,人类现如今的生活便利和迅捷是建立在大自然中一些动物的痛苦之上的,也是大自然的容忍基础之上的,而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于某些特殊环境下的动物而言可能是致命的。石一枫的长篇小说《白熊回家》(2020)仅从题目上来看,是一个以苦难、磨难为主题的“归乡”故事,但作家却没有大肆的渲染北极熊“归乡”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坎坷或痛苦,反而从一个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而基因突变的“熊小黑”诞生讲起。“熊小黑”在一群雪白的北极熊当中无疑是一个“异类”、一个有别于其他北极熊的存在,也就从这里起,作家为后文的叙事埋下伏笔,暗示北极熊在未来将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种群繁衍危机等现实问题。

实际上,动物叙事“恰恰是人的叙事。作者的情感判断、价值观念、思考模式、情趣韵味等都在其中。……凭借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动物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其中必然注入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悟与理性哲思。”<sup>②</sup>不容置喙,在文学创作中选择动物叙事这样的手法,本就是作家为了增加人们对生命体验的层次感,加深人对自然生命的理解与尊重而采用的策略或筹码,目的在于为了减少人类对动物的歧视、蛮横和粗暴,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恢复到融洽的状态,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这对动物而言是性命攸关的,同时对人类而言更是当下的迫切之举。当提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以及它们的生存处境状况时,不禁让人想起《瓦尔登湖》中的知名片段——“要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古时候,跟现在一样,就有了这类古老而可敬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如果森林被砍伐了,矮枝和嫩叶还可以藏起它们,它们还会更快地繁殖呢。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sup>③</sup>这段话给人们以狠狠的训诫,为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要在失去这个世界之前,及时认识到并纠正人类自身所犯下的错误,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要明白知识的界限是无穷的。人类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那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傲慢和偏见最终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因为,“人类又是大自然的人类,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塑造了人类,大自

<sup>①</sup> 陈佳翼.“动物”的隐喻:关乎人与自然的诗性叙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一类母题类型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4(8):80.

<sup>②</sup> 陈佳翼.“动物叙事”中的人文情怀——新世纪动物小说类型化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7.

<sup>③</sup> [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3.

然的盛衰决定着人类的盛衰，人类也许永远属于大自然。”<sup>①</sup>如果要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需得从现在善待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 （二）“兽性”与“人性”

在有关“兽性”和“人性”的讨论方面，石一枫的长篇小说《白熊回家》（2020）与老舍的《猫城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家采取荒诞的手法，在“白熊帝国”建立之前，远洋漂流之时，让熊独眼和熊小黑都与动物研究专家“煤球老爹”学会了人类文明，再将二者进行对比，熊独眼代表的是黑暗的恶势力，而熊小黑则是正义善良的化身，这一“正”一“邪”之间的较量和形象塑造，真可谓极尽讽刺之能事。当白熊们惨遭人类捕猎者的毒手时，熊独眼立马倒戈，将人类视作自己的“大王”，带领人类找到了所有的白熊，后续为了能够多得到几条小鱼填饱肚子，去给人类表演节目，扮演小狗。不得不说，通过熊独眼的一些行为，有力地讽刺了人类社会中的“走狗”们溜须拍马、为一己私利出卖灵魂的不正当做派，借此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和意识。邪恶势力的代表“熊独眼”带领北极熊们在南极建立起的“白熊帝国”，其运转方式、统治方式，完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熊独眼”作为南极的侵略者兼统治者，奴役迫害当地的企鹅，剥削其劳动力和剩余价值，而这简直是人类社会资本家的“翻版”，借以唤起人类的觉醒意识。正如老舍在《猫城记》中描述了猫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在一天之内完成，通过这种猫国教育的自欺欺人，唤起人类的忧患意识一样。而作为正义化身的熊小黑，虽然自出生后，因个体的肤色问题遭遇到一些嘲讽和不公平的待遇，但它心存良知和善念，面对熊独眼的“苛政”：剥削成年企鹅的劳动价值、为从小培养顺从的企鹅工人，硬生生抢走企鹅蛋去工厂孵化、企鹅只配用工作赚来的微薄收入买点鱼头鱼尾之类的边角料维持生命……熊小黑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推翻了白熊帝国，救出了被“软禁”的同类，也让被奴役的企鹅们重获自由。从熊小黑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勇于抗争的“兽性”其实也是采用讽刺的形式，来暗喻人类社会，面对统治或迫害，面对不公平，要勇于同恶势力作斗争，呼唤着“人性”中的一种刚毅果敢的抗争精神。

不言而喻，小说的表象虽则是描绘北极熊的群居状态，展现的是北极熊们之间尔虞我诈的一种“兽性”，不过，却实实在在地通过动物身上的种种“兽性”来讽喻复杂而多面的“人性”。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猫城记》和《动物庄园》中都有所体现。值得一提的是，《猫城记》中的故事是虚构的，而其“所指”才是实，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及教育等多方面的暗喻，从中能够感受到对“人性”中的愚昧、麻木、落后的讽刺。小说《动物庄园》中的各种动物因农场主压迫过甚，在一群猪的带领下，成功造反，赶走了农场主。动物们本

<sup>①</sup> 贺绍俊.《云中记》《森林沉默》的生态文学启示[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3):151.

以为终于换来了自由、平等的生活，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可结果却是跳进了另一个“围城”，自身的境况和原先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罢了。动物们脱离了现实，过于理想化，导致自身最终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进一步地说，小说《白熊回家》（2020）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暗喻的才是“实”。像这种类型的寓言小说，虽然虚拟了一个“兽性”的社会形态，但反映的却都是现实社会诸多的问题与矛盾，而这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世界；在这里，不仅人类社会中的一些苦闷彷徨、愤怒怨怼都能够得到栖居，而且其中蕴含着更深沉的对“人性”冷峻的思索与批判。“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sup>①</sup>换言之，恰是这种“异类”的存在、这种不可靠的叙事，使得小说具有“虚实相生”的双重境界，使得作者拥有无限的写作空间，致使其叙事反倒变得可靠起来；因而，从白熊眼中看到的世界才更具真实性、更具揭露性。石一枫在小说中运用动物叙事和寓言的模式，对所谓的“人类文明”“基本的人性”进行了一次鞭辟入里的揭露与批判。

---

<sup>①</sup>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1.

### 第三章 城市书写视域下的审丑意识

进入新世纪,城市化的推进不断构建彰显现代化风格的城市景观,从整齐划一的住宅和街道,到大型购物商超、摩天大楼等,在改变城市地理景观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城市文化,与此同时,城市和人异化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70后”作家石一枫敏锐地察觉到城市空间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加之以资本为动力暗流涌动的城市要比以田园气息为主导的乡村更容易激发作者对社会、对现实乃至对人类的深刻思考。科班出身的石一枫对西方文艺思潮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了然于心,这些理论和思想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到他的创作。小说中对精神荒原的描绘以及对城市中一些“丑陋”的揭露就表现了作者的审丑意识。

#### 一、城市景观的描摹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与逐渐深入,城市(镇)的发展已从当初的无序扩张渐渐变得理性,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管理制度及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日臻完善,导致这些城市对周边及更远处有着巨大的吸附力,尤以京沪广深一线城市这种大开大合的包容性甚为突显。而在这过程中,城市对人的吸引力也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年轻人)由此选择进城务工、并试图通过个人的奋力打拼试图在城市里取得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与此同时,不断扩容的城市也逐渐彰显其前所未有的巨大包容性,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城市生活体验。而这种“巨大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环境不可避免地分成了不同的生活空间、不同的群体生成、不同的社会层次,深居其间的人们如同生活在平行时空一般,虽在同一座城市当中,彼此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发生交集。现如今小说中的官场叙事、底层叙事、以及知识分子题材叙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城市景观,然而直接以城市规划或者城市设计为主题的小说却寥寥无几,反而以城市为小说背景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时,城市景观逐渐与人格异化、精神迷失、人性堕落等词汇产生关联。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文学成为新的写作主导方式,“作家们不再依照对社会的共同理解进行创作,而是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从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方式出发,来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sup>①</sup>例如“70后”作家卫慧与棉棉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个人化写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书写展示了城市中人物的迷茫、颓废,呈现了灵魂无处安置的无奈。冯唐的“万物生长”三部曲将秋水从少年成长为中年人的过程置于北京城的现代化变迁中,北京就是秋水成长的重要背景,影响了秋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徐则臣作为城市“异乡者”,

<sup>①</sup>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38.

对城市的认识和描摹较之北京“土著”作家还稍有不同，在作品《如果大雪封门》和《啊，北京》中写到了城市中的拥挤、匆忙、漂泊、沙尘、雾霾等城市独有意象，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城市刺痛感，因而许多作品被定义为“底层叙事”，他较多着眼于“城市外来者”，通过他们与城市之间的悲欢离合来完成自己的写作和思考。

北京“土著”作家石一枫对城市的认识可能没有徐则臣考虑的那么沉重，但是，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他却能够站在北京特殊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理性而客观地看待北京这座城市和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从“审丑”视角出发，深入地去挖掘城市背景下人们身上的悲欢离合。在其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通过王亚丽的思绪列举了城市中不相交的生活空间：在高楼林立、散布着工地和立交桥的地方，“他们早上像打仗一样挤车上班，晚上像逃难一样挤车回家，回了家就把灯一开把门一关，此后与外界隔绝联系。这些人仿佛从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北京’。”<sup>①</sup>而麦子店这个地方却不同，“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咖啡馆，有经营各种没用的小玩意儿的文创商店，有上演‘不插电音乐’和‘无台词话剧’的酒吧书吧。如此种种，使得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工厂宿舍和报废车间滋生了古怪的生机。”<sup>②</sup>至于“燕莎”和“凯宾斯基”，乃至天安门城楼那些地方，就是王亚丽“摸不着也想不到的”北京了。由此可见，作家视野所及的北京城——是一座被划分了层次或空间的大都市，而他所要着意再现的空间乃是王亚丽摸得着、看得见的地方——麦子店，这里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不分昼夜地努力奋斗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与当地人形成鲜明对比。一城已乡，这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名字，犹如那些城市务工者一般“游离”于城市当中。在石一枫和徐则臣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些“城市追梦人”有一个关系暧昧但却怎么也回不去的“故乡”，可当他们直面深居其间、奋力打拼的城市，又深感于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和无可奈何。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在而不属于”的尴尬与无可奈何造成了他们与眼前这座城市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当中。

恰如菲斯克所言，“城市是自由与束缚的混合物。它提倡某种行为方式、运动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它是终极文本，由资本、法律、秩序创造和再创造而成，它的设计是为了达到最有效的实践，即保证由资本、法律、秩序的力量构成日常生活。”<sup>③</sup>换言之，现代文化影响城市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生活秩序、日常消费活动、人际交往，尤其是破坏了原有的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价值体系，致使一种新型城市伦理关系萌芽，构成小说中复杂的人际交往模式。而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深入，城市人口激增，导致地域性的、本土的文化特征被“稀释”，取而代之的是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认同，相应的，血缘关系、邻里关系、几代人形成的

<sup>①</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sup>②</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sup>③</sup>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0.

生活方式、习惯甚至感情都被完好的撕裂，人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也就慢慢淡化了。

本雅明在其代表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指出，“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主题。那些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家以异化者的目光注视着巴黎。这是一个都市漫游者的注视。”<sup>①</sup>海外汉学家李欧梵借用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来类比上世纪二三年代的上海，“这个漫游者是个都市漫游者，他沿着巴黎的街道和拱廊，以一种无尽止又明显矛盾的关系和人群发生联系。”<sup>②</sup>可见上海这座城市及其“都市漫游者”的城市姿态成为困扰着他们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反观石一枫以北京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小说，诸如《恋恋北京》（2012）、《节节最爱声光电》（2010）、《五年内外》（2019）、《不准眨眼》（2006）以及《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等，不难得知，作家在审视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时，并没有把北京城按传统定义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是如同波德莱尔把巴黎寓言化一样，他将北京也寓言化了，着重描述生存、打拼在这座城市中一个个“外乡人”的身份问题、归属感问题、价值认同以及他们不得不面临的精神困境等等。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开篇第一句写到“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以此拉开灯红酒绿的北京城的喧哗与骚动，随之作家便将麦子店这个地方赋予了一种寓言色彩，带着一种“审丑”意识看着麦子店“半夜有人抽风大笑，清晨有人痛哭流涕，不分昼夜都有人喝多了躺在马路牙子上晾肚皮。”这种带有丑态的人物形象与北京城的繁华、庄严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们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复杂的心情。小说临近结尾时，作者仿佛寄身于主人公王亚丽，她以一副“都市漫游者”之姿踉跄而无助地走在大街上，她只是朝着治安岗亭走着，小说以此作为结尾，最终报警与否无从得知；况且，王亚丽以这样的“漫游”之态行走在城市的中央、并走向小说的结尾，至此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一种真切地“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叙事奇效油然而生，而这都是基于城市独特的景观。

作家通过笔下那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大多“生而孤独”，而这种源自心理上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所有触及灵魂的孤独感与疏离感，都是城市造就的。城市独特的运转方式不仅造成了一个个城市青年“茕茕孑立”的都市困境，由此还引出他们在精神世界上的荒原之感。纵览整部小说，不难发现，这篇小说要揭示的不止于基于现实层面处于城市边缘那些个体的“形单影只”，更有涉及到精神层面上反映出一种荒原意识。众所周知，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创作，均在一定程度上曾对繁华的都市与贫瘠的精神荒原进行过刻画。很大程度上，发生于上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摧毁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他们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放纵和欢歌的迷醉

<sup>①</sup>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本)[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49.

<sup>②</sup>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本)[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49.

气息,可当时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却与人们的精神荒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作家以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和原型进行的小说创作,作为“迷惘的一代”的发轫之作,这部长篇较为真切地反映出彼时青年一代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放浪形骸的生活和无路可走的精神迷惘。菲茨杰拉德以小说《天堂的这一边》(1920)和《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揭示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纸醉心迷和空虚迷惘”<sup>①</sup>,被视为那个当下美国国情寓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主人公盖茨比的悲剧人生犹如昙花一现,他的死意味着人人可以“机会均等”地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残酷的现实中的破灭。这部以作家自身经历为原型,其以一种理解甚至参与的状态,毫不掩饰地呈现了战后青年一代为“美国梦”而疯狂的痴迷情状。毫无疑问,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他们以带有一种“自传”色彩的小说创作,均在不同程度上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人类面临困境时由荒原感、孤独感构成的精神迷惘。石一枫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还铺设了一条时隐时现的暗线,借以揭示出深处城市边缘的人们、尤其年轻人的精神处境——无助而绝望,冷漠而荒凉——小说中每个人物似乎都被流放、被抛弃到一个精神荒原之上。

有鉴于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这群游走于城市边缘而投靠无门的来自外乡的年轻人,他们不只是漫无目的地行走在现实中的城市边缘,同样游走在个人精神的“荒原”之上。对于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他们而言,几乎不会考虑什么形而上的存在,他们以为走进教堂就等于抓住了可以拯救自己的精神之手,并将之当作个人灵魂可以寄托的最佳地点,同时还“笃信”在眼前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有了能够理解、原谅以及爱护并不完美的自己的存在。于是便有了小说中身患心脏病、独自在北京打拼的岳晓芬斥巨资去维持“团契”,王亚丽在接触了基督教后从起初的“混饭”到慢慢的能够理解岳晓芬的处境和选择,不知不觉中,王亚丽也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因为在王亚丽这片精神“荒原”上,业已出现了某种若隐若现的“抗争”苗头——“她从来就没有信过什么,以后也不会再去信什么,但在此时,她却忽然看见,从那深不见底的茫茫夜空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辉煌地降临。”<sup>②</sup>结尾处的这种“暗示”,再次凸显了作为游走于大都市里的芸芸“漫游者”之一的王亚丽,其内心世界已渐渐饱满起来,已不再感到那么荒凉、孤寂和无助了。当然,小说以“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为题,既是对基督教赞美诗歌《沙仑的玫瑰》的化用,更是在于对“都市漫游者”及其精神荒原之况的哲学式叩问。

<sup>①</sup> 陈丽.迷惘的一代[J].外国文学,2005(6):51.

<sup>②</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 二、“审丑”视角对城市人物群像的提炼

### (一)“审丑”视角

一般而言，“美”是光鲜的，也是令人愉悦的，是一种包含理性的感性形态，美的形态非常丰富，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追求和向往的美好存在；进一步说，美的对象具有形式上的和谐感，美的价值属性对人类具有积极的肯定作用。长期以来，传统创作均以体现真善美为基本倾向的表达逻辑，相对于“美”的对立面——“丑”往往又是避而不谈的。然而，感性的领域不仅包括美，也包括丑，正是美丑结合在一起才真正表现为完整的感性学。而从感性学的角度来看，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众多的感性，其中“审美”与“审丑”均是表现力极强的两种感性。因而，从“审丑”的层面来审视文学、影视等这类以表现生活与人生的艺术现象之时，人们可变换自我观察生活和思考人生的惯常逻辑，而“真正的艺术‘审丑’，是深层次地发掘貌似‘丑陋’或‘丑恶’现象背后的内在缘由，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是刨开‘坏种们的祖坟’，让观众们发出会心的微笑。”<sup>①</sup>换句话说，文学领域中的“审丑”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以丑补美”，而要充分理解和反思“丑”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带有强烈批判性和深刻性的内容或存在。

某种意义上，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所表现出强烈的“审丑”倾向令人为之侧目，诗人借此深入到社会和个人意识深处去发掘“丑”、表现“丑”，并借此开启了西方文艺中的全面审丑时代。紧接着，文学领域中涌现出了更多审丑倾向的佳作力作，比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乃至小说家卡夫卡的《城堡》等等，它们打破传统意义上追求真善美的创作逻辑，均在不同程度上将“丑”纳入艺术表现生活的范畴当中。需要指出的是，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对老人桑提亚哥这一形象的倾力塑造、对自然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的象征性描写，老人的生活窘迫、样貌丑陋、思维僵化，等等，恰恰是这些“有碍观瞻”的“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一种隐喻再现，由此将小说探讨的主题从个人层面上升到整个人类层面——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弗洛德无疑是一个丑恶的印象，他直接造成了“美的化身”爱丝美拉尔达的悲剧——他试图将爱丝美拉尔达占为己有、却遭到她的断然拒绝，于是他恼羞成怒将吉普赛少女交给国王的军队，导致无辜的姑娘被绞死。作家以“审丑”的姿态将弗洛德因得不到“美”而心生怨恨、并终而毁灭“美”而后快的恶行表现的淋漓尽致，而这同样是对审丑视角的运用与拓展。可见，恶与善、丑与美、卑鄙与崇高虽说一念之间，本质上却是小说再现人物形象丰富性与深刻性截然相反的感性终端。

毫无疑问，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加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

<sup>①</sup> 王伯男.审丑——美学评价的逆向思维[J].社会科学,2012(1):187.

及平台的广泛融合，涉及社会问题的资讯可谓天天爆炸性地涌来，人们只需打开移动终端便可随时随地实现对信息资讯的分享与获取。如此情形之下，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学的表现空间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挑战，特别那些直面社会问题的现实之作？就本质而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原本就是虚构的场域，其通过较为精湛的语言艺术与表达直抵人的内心、思想以及精神世界。尽管时下传统文学创作不得不面临着较大幅度上的冲击或挑战，但仍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和表现可能。

## （二）人物情感之扭曲

在传统观念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血浓于水”的不离不弃，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都关心爱护彼此，甚至有时候可以不分善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不论承认与否，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都不可能是单面的、扁平的存在，而是多面的、立体的呈现。然而，石一枫小说中却时常可见“父母不慈”“儿女不孝”的现象，可想而知，作家之所以在创作中有别于传统，是作家的一种“有意为之”还是有其他的考量？

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主人公王亚丽的父亲被“捉奸”后、随即与王亚丽的母亲离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这种有悖常识的情形让年龄尚幼的王亚丽真切地体味到“亲情”的淡漠与决绝；离婚后母亲独自抚养王亚丽，一看到王亚丽就想起她父亲那段不堪的“往事”，母亲对父亲的不满以及对婚姻的所有怨怒与愤懑都发泄在了王亚丽的身上，再次体味到了“亲情”的扭曲与变形。这种被生母视为泄愤对象的日子充斥着王亚丽成长的绝大部分时光，可以想见王亚丽因此所受到的伤害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虽然无法斩断与身俱来的血缘关系，从更具延展性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看，王亚丽眼里的生父生母早已失去了“亲人”本该带给她的细致入微的照顾与温暖——他们的所作所为业已背离了人们对“亲人”最初的理解与期待，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王亚丽，早已心死、变得“了无牵挂”。听说大城市的钱多、机会多，王亚丽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试图通过努力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来。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在北京打拼路上的王亚丽，先后遇到几位非亲非故却看起来胜似“亲人”的人——先是吃河南烩面认识的老乡“果粒橙”，接下来是基督教徒岳晓芬，还有“团契”中的“伙伴们”。首先，“果粒橙”以简单而粗暴的方式不仅占有了王亚丽，还确定二人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然而，平日里的“果粒橙”不时地对王亚丽进行难以入耳的谩骂，王亚丽忍气吞声久了便起了反抗，对此“果粒橙”却说，“你怎么就不懂，骂你是把你当亲人哪。”<sup>②</sup>一听到这话，王亚丽骤然间泄了气，“还有谁把王亚丽当亲人呢？而王亚丽又是多么需要一个

<sup>①</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sup>②</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亲人啊。”与“果粒橙”之间的恋爱关系顿时被上升到“亲人”关系这种层面，真是“打是亲，骂是爱”，一句“亲人”让王亚丽气消了、也服软了、还“欣然”接受这种不沾亲带故的“亲人”关系，往后王亚丽便在这种“痛并快乐着”的复杂心境中接受了“果粒橙”不时地对自己施以的“言语暴力”。其次，一向和善且虔诚的基督教徒岳晓芬，在王亚丽最为无助之时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慷慨解囊、救王亚丽于窘迫之时，让身处陌生城市里的王亚丽大受感动。为此，岳晓芬在王亚丽极为贫瘠的“亲人版图”上有了特别的位置，被王亚丽视为温暖可亲的“姐妹”，在还给岳晓芬医药费时，信任地将“果粒橙”寄存的十万元转到岳晓芬的银行账户上。“团契”中的“伙伴们”同样是在陌生而又无助的情形下为王亚丽送来了温暖和信心，但王亚丽把这些人带给自己的温暖归功于岳晓芬姐妹的付出——正是有岳晓芬无偿地租下了房子，才有了“团契”中的“伙伴们”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

极富生活感受力和敏锐观察力的极富作家石一枫，深感于北京城里普通人（尤以外乡人）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他们不得不面临冷漠而游离不定的人际关系（陌生人社会），始终把关注的视角贴近每个游荡于城市边缘的人（尤其年轻人）以及他们寻寻觅觅、无处安放的灵魂与精神寄托。相比之前的京派文学大家，石一枫有其不同以往之“特别之处”——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土著”，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北京城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同时耳濡目染于城市环境下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以及城市边缘人群越来越艰难的生存境况。如上所述，不难发现，漂泊于北京城的王亚丽，她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亲人”们，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亲人”关系的认定与熟知——基于传统中国农耕社会背景之下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种种亲属关系，“即直系和旁系血缘构成的宗族关系，它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sup>①</sup>小说中的王亚丽，从年幼时就遭受来自父母失败婚姻的伤害与种种责难，因而对传统意义上的“亲人”关系失去了信心，于是离家到北京城来打拼，与同样打拼在北京城的“果粒橙”、岳晓芬以及“团契”中的“伙伴们”建立起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亲人”关系。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上的基于熟人社会的“亲人”关系在小说中被作家一步步地消解和解构了。与此同时，作家又试图通过发生于北京城中一个个并非基于血缘而建立起的“亲人”关系——另一种“亲人”关系模式——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就如“果粒橙”、岳晓芬与王亚丽之间发生的这种彼此间不存在血缘关系、也不沾亲带故，却在共同的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因缘际会”地相识、相伴、进而相互之间“抱团取暖”。

值得一提，作家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这种消解传统意义上的“亲人”关系，继而重构一种有别于前者、基于陌生人社会之“亲人”关系的写作模式并

<sup>①</sup> 王瑞平,王荔.传统血缘关系的弱化与新型社区建设[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3):125.

不是石一枫第一次运用。这种写作模式近乎成了作家建构城市环境下各色小人物之关系的一种既定的路数。小说《心灵外史》(2017)中的主人公杨麦,其父母当时因为“认命”而组合家庭,各取所需,但母亲却在杨麦上小学时遇上了曾经的初恋对象,于是决心“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sup>①</sup>,然后寄回一纸离婚协议,再也没有回头。母亲父亲忙于谈判,对儿子杨麦不管不问,他们眼里的杨麦,如同空气一般变成了一种多余甚至透明的存在。那时那刻,传统意义上的“亲情”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矛盾、直至最终的决裂,而大姨妈的“空降”带给杨麦母亲般的关爱和温柔,从而让杨麦对“亲人”的感知有了几分“错乱”之嫌——主人公杨麦与生母的各种争执与冲突,和与大姨妈之间的惺惺相惜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意义上的“母子”关系的消解与重构,继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一般认知的“母子”(杨麦与大姨妈)关系。相比之前的《心灵外史》(2017),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有其“不同之处”:作家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消解-重构”这种“一破一立”的叙述模式,在追问人的精神问题方面石一枫可以说一直在路上,这部新作在探问卑微人生何处去的时候又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表达意蕴——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中的主人公王亚丽,她从小缺失的亲情,缺失的亲人温暖,任凭后天再怎么努力与挣扎也弥补不回来。一般而言,人生越缺少什么,便会在生活中极力找寻什么。王亚丽虽在空间上远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但这并非出于其真实所愿,而是生活现实所迫,是出于一种逼不得已的“自我逃离”;而实际上,王亚丽对亲情是极为渴望的,这也是其虽身处陌生的城市也无比渴望亲情和亲人般温暖之根由所在。同为外乡人、与王亚丽命运相似、又彼此发生着关联的这些“亲人”们,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各取所需”,他们之间这种所谓的“亲人”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彼此之间情感的关联度,但其与以血缘为纽带的“亲人”关系存有本质的区别,当这种“亲人”关系面对考验时,远没有金钱对感情的拆解来得快。就如同小说中被王亚丽主动视为“亲人”的岳晓芬姐妹,虽看起来为人和善、也有些笑看风云淡,但当她见到自己的银行卡中“实实在在”地多出了“十万元钱”之后,她为自己找了一个“活着”的理由,随之便消失在王亚丽的前面,去了她想去的医院。

### (三) 人物群像之“丑”态

石一枫最早发表在《十月》2020年第1期上的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2020)可以说让人触动灵魂、为之思虑良久。小说以第三人称来展开叙述,主要塑造了王亚丽、郭立成(“果粒橙”)、岳晓芬这三个人物,其中巧妙之处在于,虽然以全知视角介入文本叙事,可是作家却始终没有对这三个主要人物有过一句、甚至半句的直接描写,我们对每个人物的了解及其各自性格的把握,均是从文字描写的侧面得来的,其间颇有一丝曹雪芹塑造“林妹妹”之“妙”。就如对王亚

<sup>①</sup> 石一枫.心灵外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3.

丽的刻画而言，通篇对王亚丽这一人物的外貌描写少之又少，然而我们又是如何知晓王亚丽这一形象的？首先，从暗恋的男同学处我们得知，“王亚丽，我觉得你长得像一头驴……”<sup>①</sup>到现任男友“果粒橙”在她摔伤额头时嘲笑她像“马王爷”，平时对王亚丽的称呼更是“傻驴”不离口：“王亚丽，你个傻驴”、“你个傻驴，不刚打完电话吗？”、“你个傻驴，认清了人再叫唤。”俗话说，“三天的孩子丑似驴”——借以形容新生儿刚出生时，丑到“没眼看”。而驴这种动物似马、貌奇丑，以此来比喻人，突出人物的愚蠢、笨拙、无能。由此可见，作家在描写王亚丽这一人物时用到“驴”可以说是有所指的，为她后来做的一系列笨拙之事——毫无保留地将男友寄存的十万块钱转给岳晓芬、去北京大爷那施展“仙人跳”等埋下了伏笔。其次，王亚丽与男友之间确定男女关系的过程也是比较让人感到无语的——仅仅是在异乡得知对方是老乡，就发生了“关系”，自此以后，两个人便不明不白地“搭起伙来”过日子。这种各取所需的“莽撞行为”，无疑是草率而鲁莽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亚丽还伙同“果粒橙”去向北京大爷施展“仙人跳”企图敲诈一笔巨款，至此不难发现，作家塑造这几类人物形象，重点是想要突出表现城市生活中一些尚未泯灭良知但又市侩、奸猾、自私自利的小人物群像。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加快，离婚率也在逐年上升。王亚丽在父母失败的婚姻中是无辜的，但是其所受到的创伤是最大的，也正是这种亲情的缺失，致使她在北京的漂泊之旅中，一遇到别人给予的温暖，便立马燃烧自己回报别人，这也正是她选择相信陌生人“果粒橙”、岳晓芬的根源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王亚丽身上的质朴、善良没有完全消失殆尽，而她的这种质朴与单纯，促使她可以毫无保留地选择相信向自己“示好”的陌生人。男友“果粒橙”跟王亚丽一样，都是“京漂”中的一份子，从事着在多数人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无社会地位的房屋中介，只因不满雇佣关系和比较低微的收入，他违背职业操守，凭借“飞”单赚来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故而惹恼了身为“地头蛇”的老板，遭遇各种追截拦堵，落得个头破血流，浑身带伤。直面现实，他同样有自己的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中介公司，能够在北京真正扎下跟、站住脚。为了攒够开店的资本，他近于变态地克扣自己日常的生活费，在即将见到曙光时，通过“非人般”的状态攒下来的钱却不翼而飞——这种打击和重创对他而言，无疑是致命的，而这为其在“仙人跳”计划失败后，对北京大爷疯狂施暴埋下了隐患。岳晓芬这个因为“画上的男人”（即基督教）而结识的女孩，只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她极为珍视生命中的每一天，她虔诚的信奉着基督教，对身边的人格外和善，认为她的一切都是主的安排。要知道，这种和善的形象给人以“美”的感觉，可是小说却画风一转，她却带着王亚丽转给她寄存的十万元消失在茫茫人海，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最后，人们才透过小说的字里行间明白了这位看似和善的岳晓芬

<sup>①</sup>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2020(1).

前后如此巨大反差的动因——只因她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而这“希望”正是那“十万块钱”。

在《营救麦克黄》(2016)中，石一枫塑造的角色可以说十分丰富，既有出版社主任尹珂东，又有房地产商“富二代”，公司高管黄蔚妮，还有外地留京的大学生颜小莉，以及住在“窝棚”里的外来务工人员。“麦克黄”是黄蔚妮的爱犬，为了这条狗，她可以放着公司里的大事小事不管，而“麦克黄”走丢之后，黄蔚妮进行了一系列的寻找活动，最终，在一次拦截运狗车辆的过程中，撞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九岁女儿郁彩彩。小说中黄蔚妮对爱犬的生命视若珍宝，而对一个九岁女孩的鲜活生命却熟视无睹、选择性遗忘。不难看出，在城市发展的步调中，人们变得越发自私，格局也越来越小，人性的丑陋在城市机器的推动下一览无遗。诚然，黄蔚妮以及尹珂东等人的淡然、冷漠是作者要揭示的丑陋，但是他们之所以选择逃避和推脱责任，也考虑到当下真实的境况，他们担心万一承担了女孩的医药费，女孩的家人便讹上他们。而郁彩彩的妈妈最初对颜小莉的关心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而颜小莉掏出200块钱之后，便表现得极其热情，这也让人难免担忧，这样的家庭，就算拿到了赔偿金，是否会真正用到女儿的身上。石一枫对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客观而理性的分析，不管阶层如何，都能发现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和丑态，小说中，毕业留京的大学生颜小莉，虽然最后找回良知，但是，最初的时候，仍然梦想着靠她和公司高管的“姐妹关系”慢慢“往上爬”。石一枫仿佛洞悉了每个人物内心的小算盘，在这样的审丑意识下，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弱者的同情、对强者的批判理念，以此抽象出城市中各个人物的群像概念。

在小说中，作家有意不去描写这些人物的具体样貌，只给人们留下一连串模糊的影像，这些“模糊的影像”仿佛就是现实社会中所有在外拼搏小人物群像——他们虽然身处都市，但他们与身俱来的、刻在骨子里的乡土中国固有的“熟人好办事”之传统观念仍在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哪怕目之所及，皆是繁华与人群，但他们仍然遇不到真正的朋友、找不到都市人那种真正的存在感和归属感。与繁花似锦的都市街景、比肩接踵的高楼玉宇相比，这群犹如“小丑”般的存在，他们与整个城市格格不入。就因如此，才造成作家在对这群人进行“素描”时产生了一种形式上有别于“审美”却远比“审美”更深刻的“审丑”之美学效应。

作家通过对王亚丽、“果粒橙”、岳晓芬及颜小莉迥异性格的呈现与剖析，试图为人们揭示出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以及游荡于城市边缘的青年人的种种生存困境。尽管这些人经过在城市中生活日常的摸爬滚打，以个人的血与泪换来了仅能“苟延残喘”于城市的微弱经验及技能，但他们日常待人接物过程中仍旧万分警惕，对周围的所有人保持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谨慎”与“警惕”，他们紧紧地把自己包裹起来，然而由于长时间缺少关爱又使他们禁不起别人对自己持续“示好”的诱惑。这样的“关爱”和所谓的“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漂泊于都市空间里那些孤独的心之间的距离、甚或可以相

互慰藉彼此；但终究抵不住金钱对人性的腐蚀，而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尴尬与难堪，正是作家要呈现给世人的地方：一方面，肯定了异乡人在大都市北京打拼的不易；另一方面，揭示了大都市虽有其极强的包容性和宽容度，但种种“规矩”不仅是无情的、更是难以逾越的，一个人若想真正融入其间，仅凭“关系”和一腔热血只是徒劳。表面上看，作家对笔下这群“京漂”的乡村经验看似一笔带过，不过寥寥数语，而实际上，作家通过再现他们打拼中所表现出的与大城市种种的“格格不入”，以此来揭示他们身上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裂与撕扯，从而使文本具有越发强烈的冲击力与感染力，恰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不对老人桑提亚哥的去进行浓墨重彩地描述，而是通过叙写桑提亚哥捕鱼时各种技巧的无比娴熟，借以更加凸显老人那种坚韧无比的“硬汉精神”，并给人的灵魂以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 结 语

通过上文对石一枫小说创作的三大主题研究,我们发现在其文本中,有关个体的青春成长之路是他创作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内容,作为北京“土著”的他,生动地刻画了许多“大院”子弟,他们表面看起来纨绔、叛逆,实则个性鲜明,敢爱敢恨。同时,石一枫也关注到了许多“异乡漂泊者”的成长,他们容易自卑、容易被金钱异化,缺少认同感,内心深处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执念。随着自身文学实践的不断丰富以及个人生活经验的日积月累,石一枫的创作风格越来越倾向于传统文学,开始关注到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当代社会人们普遍的精神困境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等。与此同时,他对小说创作技巧的把握与运用日益珠圆玉润,逐渐适应、并擅长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表现小说人物的内心冲突及其思想情感在刹那间的微妙变化,以此突出笔下各色小人物的个性特征,并揭示他们各自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进而展现社会、时代对城市边缘青年造成的无形的精神压迫与创伤。另外,对石一枫而言,最熟悉的莫过于北京的城市生活,因而在写作中,对于一些城市意象比如“大院”、街道、购物中心以及单位小区等的塑造可谓信手拈来,贯穿于文本之中。石一枫的一部作品往往呈现多元化主题,他在城市书写视域下还表现出较突出的“审丑”意识,透过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的现象,分析其背后形成的原因,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其创作可谓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在“转型”后,他将笔墨较多放置于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揭露方面。对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石一枫有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传统了”,认为好小说的标准是“一,能不能把人物写好?二,能不能对时代发言?”尽管这可能是老掉牙的论调,但他“逐渐发现,这两条要做到位真是太难了,不是僵化地执行教条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才华、眼界、刻苦和世界观。”<sup>①</sup>可以说,石一枫凭借作家的自觉认识到了好小说的标准所在,而且其小说创作的现实性、时代性与社会性也日渐鲜明而稳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正在向他所说的“好小说的标准”不断靠近。石一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在地性和当代性,他以“闲人”的身份进入这个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写整个国家和社会,写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对阶层、道德、良知等的思考和探索甚至超越了国家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石一枫在审视个体的成长历程时与许多“70后”作家不谋而合,这表明石一枫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代际特征,通过对其作品的主题研究,可以看出,其作品丰富了“7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而他本人也在“70后”作家群体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70后”作家喜欢聚焦于生活深处,将个体经验带到小说创作中,乔叶在《失语症》中讲述了失语症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李浩在《镜子里的父亲》中,透过镜子展现具有多面形象的父亲,实际上是追寻未知的真相

<sup>①</sup> 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J].创作与评论,2015(10):120.

和真实的自我。“70后”作家所共有的创作主题与其成长的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他们喜欢将审视的目光对准自己，石一枫在前期的青春系列小说的创作中也不例外。不过，石一枫创作转型后，表现了对传统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后”作家同质化的日常写作和自我复制的创作局限，尽管石一枫对社会问题以及历史的切入点依然是小人物、小事件，没有“50后”“60后”作家那样宏大的视野，但是他在创作上敢于自我革新、大胆创新，达到了“曲径通幽”的效果，可以说已经为处于创作“瓶颈期”的一部分“70后”作家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启发和参考范式。借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写作的道路上，石一枫还会走得更远。

## 附录

石一枫主要创作年表:

- 1996 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上学》，《北京文学》  
1998 年短篇小说《流血事件》，《北京文学》  
2006 年中篇小说《不准眨眼》，《西湖》  
2007 年长篇小说《b 小调旧时光》，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年出版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九州出版社  
2010 年长篇小说《节节最爱声光电》，新世界出版社  
2012 年长篇小说《恋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2 年长篇小说《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年长篇小说《我妹》，外文出版社  
2014 年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十月》  
2014 年小说集《不准眨眼》，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 年小说集《合奏》，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 年中篇小说《地球之眼》，《十月》  
2016 年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年长篇小说《特别能战斗》，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6 年中篇小说《营救麦克黄》，《芒种》  
2017 年长篇小说《心灵外史》，《收获》  
2017 年中篇小说《借命而生》，《十月》  
2018 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三个男人》，作家出版社  
2019 年长篇小说《她和她妈的斗争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 年小说集《五年内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中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十月》  
2020 年长篇小说《白熊回家》，《人民文学》

## 参考文献

### 作家作品

- [1] 石一枫. b 小调旧时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 [2] 石一枫. 红旗下的果儿[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 [3] 石一枫. 恋恋北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
- [4] 石一枫. 节节最爱声光电[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
- [5] 石一枫. 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 [6] 石一枫. 我妹[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3.
- [7] 石一枫. 合奏[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 [8] 石一枫. 地球之眼[M].十月, 2015(3).
- [9] 石一枫. 营救麦克黄[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
- [10] 石一枫. 世间已无陈金芳[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 [11] 石一枫. 特别能战斗[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 [12] 石一枫. 小李还乡[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13] 石一枫. 三个男人[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 [14] 石一枫. 借命而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15] 石一枫. 心灵外史[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 [16] 石一枫.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J].十月, 2020(1).
- [17] 石一枫. 白熊回家[J].人民文学, 2020(6).

### 专著书籍

- [1] 宗白华. 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2] [墨]奥克塔维奥·帕斯. 帕斯作品选[M]. 赵振江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美]亨利·梭罗. 瓦尔登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4] [苏]巴赫金. 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5]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6] [捷克]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7] [美]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M]. 杨全强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祝亚峰. 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 [9]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2] 赵园. 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3] [美]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5.

- [14] 克罗齐. 美学的历史[M]. 王天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5]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修订本)[M]. 毛尖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 学位论文

- [1] 宋田澍. 既问苍生, 也问鬼神——石一枫小说创作论[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8.
- [2] 李婧婧. 新一代作家想象北京的方法——以冯唐、石一枫、徐则臣为例[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9.
- [3] 翁荣江. 从“怀旧新顽主”到“时代写实者”——论石一枫的都市青年书写[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9.
- [4] 赵珊珊. 直面现实生活的“京味儿”书写——石一枫小说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学, 2020.
- [5] 屈文静. 石一枫小说论[D]. 开封: 河南大学, 2020.

### 报纸

- [1] 孟繁华. 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N]. 中国青年报, 2011-10-25.
- [2] 陈福民. 石一枫小说创作: 一塌糊涂里的光芒[N]. 文艺报, 2011-11-07.
- [3] 蒋肖斌.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才敢写什么样的小说[N]. 中国青年报, 2017-01-03.
- [4] 陈思和. 甫跃辉的小说创作[N]. 文学报, 2016-1-7.
- [5] 舒晋瑜. 石一枫: 用繁复的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N]. 中华读书报: 2017-08-09.

### 期刊杂志

- [1] 陈丽. 迷惘的一代[J]. 外国文学, 2005(6).
- [2] 王伯男. 审丑——美学评价的逆向思维[J]. 社会科学, 2012(1).
- [3] 李云雷, 石一枫. “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J]. 创作与评论, 2015(5).
- [4] 袁文丽. 城乡结构裂缝中的底层叙述——以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考察对象[J]. 中国文学研究, 2016(4).
- [5] 师力斌. 思想力和小说的可能性——从石一枫、蒋峰看70后、80后小说[J]. 创作与评论, 2016(11).
- [6] 王迅. 2016年中篇小说概评[J]. 创作与评论, 2017(1)
- [7] 黄文倩. 见证青春的“爱”或“爱情”——读石一枫《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J]. 百家评论, 2017(1).
- [8] 夏楚群. 告别“青春后遗症”: 石一枫近作论[J]. 小说评, 2017(1).

- [9] 王晴飞. 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7(3).
- [10] 孟繁华. 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4).
- [11] 吕永林. 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石一枫小说里的斗争与无望[J].上海文化,2017(5).
- [12] 王一梅.互看与重构——以《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文艺评论,2018(1).
- [13] 戚萌.《心灵外史》:文明进程下的心灵之殇[J].小说评论,2018(1).
- [14] 岳雯.“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J].扬子江评论,2018(2).
- [15] 童娣.信仰的迷途与归路——论石一枫的长篇新作《心灵外史》[J].扬子江评论,2018(3).
- [16] 师力斌.安小男的性格悲剧和小说新趋势——读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J].新文学评论,2018(3).
- [17] 李婧婧.超越“人与城”——石一枫论[J].名作欣赏,2018(3).
- [18] 赵牧.信仰迷失与叙事伦理——读石一枫的《心灵外史》[J].新文学评论,2018(3).
- [19] 胡哲.石一枫小说中“理想人物”的社会生成与文学再现——以《借命而生》为例[J].当代作家评论,2018(5).
- [20] 李彦姝.何谓同时代人?——以石一枫都市批判小说为中心[J].小说评论,2018(5).
- [21] 沈杏培.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J].扬子江评论,2018(5).
- [22] 邓芳宁.“从形象中求解救”——论70后小说的救赎母题[J].南方文坛,2019(1).
- [23] 孙立武.“结构化”人物书写策略——评石一枫长篇小说《心灵外史》[J].百家评论,2019(2).
- [24] 徐勇.成长主题与石一枫小说的现实表象问题[J].中国文学批评,2019(2).
- [25] 刘大先.时代寓言与道德故事——石一枫与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J].中国文学批评,2019(2).
- [26] 董晓珂.石一枫的空间寻绎与艺术表达——从《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五部近作谈开去[J].小说作家作品研究,2019(5).
- [27] 张小霞.信仰叙事新篇章——读石一枫的《心灵外史》[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7).
- [28] 张保弟.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恒久性——以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为例[J].名

作欣赏, 2019(9).

- [29] 李壮. 时代林荫路上的纸箱坦克——论石一枫[J]. 长江文艺评论, 2020(2).
- [30] 贺绍俊. 《云中记》《森林沉默》的生态文学启示[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3).
- [31] 彭超. 人道主义、时代转型与路——论石一枫《借命而生》的现代反思[J]. 北京社会科学, 2020(4).
- [32] 赵牧. “问题小说”及其文本性态度——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10).

## 致 谢

日月既往，不可复追。行文至此，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已接近尾声，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首过往，感喟良多。

昔日的奋斗与辛劳、欢笑与温馨都已尘埃落定。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凡，张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因材施教，能够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积极鼓励、耐心指导。在上课学习之余，老师组织我们开读书会分享学习心得，在火花碰撞中习得理论知识，促进同门友谊。老师一方面鼓励我们将脑海中的想法形成文字，另一方面，经常借助练笔的文章给我们讲解论文撰写的写作规范和注意事项，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日常生活中，张老师经常提醒我们增添衣物，督促我们加强体育锻炼，让我明白无论做什么事情，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是革命的本钱。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我要感谢所有教过我、关心过我的各位老师，李赋老师、胡新华老师、吴新锋老师、杨向奎老师、李江杰老师、朱秋德老师、王怀春老师、牟学苑老师、毛颖辉老师。老师们为我们的学业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在课堂上讲解理论、教授方法，课下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不辞辛苦。老师们为人师表的风范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令我敬佩至极，是我今后的学习榜样。另外，还要感谢教科办的王红星老师和杨盛瑞老师，他们待人真诚，能够想学生所想，在最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便利和帮助。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同窗好友，丽君、姝雅、静怡、文秀、胡港、张蒙，感谢他们在学习上、尤其是生活上对我的鼓励和帮助，陪伴我一起成长，让我对未来充满动力和希望。还要感谢排球场和羽毛球场上遇到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让我的研究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来新疆求学可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远游，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让我拥有面对一切未知和挑战的勇气。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与答辩的专家、教授！千言万语，都汇集在一声“谢谢”里，感谢石河子大学，感谢所有美好的相遇。我会将这些宝贵的记忆化作自己未来前行的动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支持！

2021. 5. 20

宋园园

## 作者简介

宋园园，女，生于1996年1月，籍贯山东。2018年毕业于菏泽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读研期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习期间与导师共同发表文章：

1. 张凡, 宋园园. 硬汉精神与英雄叙事——电影《中国机长》的主题意蕴及启示[J]. 艺术评论, 2019(11).

2. 张凡, 宋园园. 国产低成本喜剧电影的网状叙事与情感表达策略[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3. 张凡, 宋园园. 祭奠先烈是为了更好地继承革命文化[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4-06(7).

4. 张凡, 宋园园. “打卡阅读”是方式不是目的[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4-20(7).

5. 张凡, 宋园园. 诗意人生与不羁情怀——简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5-08(7).

6. 张凡, 宋园园. 小人物向何处去——简评石一枫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N].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1-02-09(3).

## 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导师评阅表

研究生姓名	宋园园	学制	3年
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术评语:

发现新人、剖析新作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之一。论文选择创作仍处于发展之中的青年作家石一枫为研究对象，展示了论文作者对当下文坛发展动向的关注，也因此体现了论文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论文既将作家备受关注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等成熟作品纳入研究之中，也没有忽略作家早期的《节节最爱声光电》等青涩之作。论者对石一枫的小说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解析，能够展示出石一枫这位作家在创作主题方面的共性，应该说论文以具体的作家创作为研究对象，总体上达成了作家创作论的研究，研究亦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带着研究角度（主题）为分析，这一研究思路及方法是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论者在论述时能够结合石一枫的具体创作展开，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石一枫小说书写中的隐喻与反思，能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展现自己对于文本的看法，通过论者的分析，能够看出石一枫在小说主题上的表现。同时，论文有意识地将石一枫放在“70后”作家、问题小说、城市创作等不同的坐标系中，在比较中定位和凸显论文研究对象的特点，思考其文学史价值。整体而言，论文选题贴合当代文坛发展趋势，符合研究对象的特征。文献资料丰富、研究思路清晰，论证充分，观点明确，格式规范，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是一篇良好的硕士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签字:



2021年6月1日